

供销合作经济

GONGXIAO HEZUO JINGJI



ISSN 1674-2516



2022

3

2022年6月28日版

总第214期

“832平台”消费帮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832平台”是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四部门指导下，由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和运营，为全国832个国家级脱贫县农副产品提供在线展示、网上交易、物流跟踪、产品追溯的一站式聚合平台。上海市财政局于2020年、2021年分别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各级预算单位充分认识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的重要意义，鼓励本市国有企业等单位通过“832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并由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牵头建设“832平台”上海销地仓，由嘉定区供销合作社负责筹建，建设本地化支持服务体系，让“832平台”的农副产品可以从脱贫地区的田头更顺利地摆上上海市民的餐桌。

激活需求侧解决“买”的问题。针对入沪标准和市民口味，依托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优势，设立了农副产品精选机制，严把产品准入门槛。借助平台，安徽寿县的鲍家湾香米飘香沪上，云南楚雄的彝家香火腿、有机核桃油等成为上海市民餐桌上的“香饽饽”，上海销地仓成为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售的“中转站”。

改造生产链解决“供”的问题。上海销地仓引导标准对接、规模生产和品牌孵化，倒推当地农副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让消费帮扶不再是简单粗放的买买买，更多的是线上线下融合后的资源升级、服务升级、体验升级和带动脱贫地区的产业升级。上海销地仓自2021年10月启动试运营，先期对接了21家供应商入驻，入库产品总数146款，帮助全市采购单位采购脱贫产品1040万元。全市2021年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交易总额1.14亿元。

打通流通链解决“畅”的问题。上海销地仓采用集采物流手段，整合订单，通过规模采购力争让上海销地仓价格低于“832平台”同款价格5%以上。配备仓储管理和物流配送体系，目前已由市供销社组织落实全系统31家门店作为线下体验店，为采购单位提供看样选品、包装配送和全程跟踪等公益性服务。通过规范的作业流程，切实为各采购单位提供“交易、服务、监管”聚合化采购方式，为整个上海地区广泛参与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把消费帮扶事业打造成促进东西部协作共赢的新引擎，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强：我们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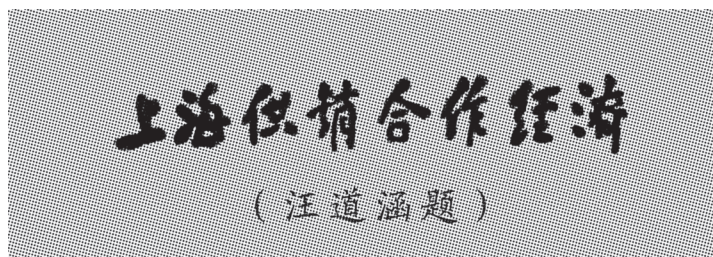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6月25日开幕。李强同志代表十一届上海市委作题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报告。

李强说，本届市委履职后半期，我们与新冠肺炎疫情作了顽强斗争。2020年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坚守“国门”，最多的时候上海口岸承担了全国62%的入境航班、53%的航空入境旅客、46%的进口冷链货物。

他说，今年3月以来，面对空前严峻复杂的新一波疫情，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央有关部门、全国各地和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十分危急的关头遏制住疫情指数级上升的势头，在攻坚清零的阶段打破了疫情胶着反复的态势，实现和巩固了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成果，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

李强表示，两年多来抗疫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大上海保卫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历史会记住为这座城市坚守和付出的所有人。

他说，向在这场抗疫大战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中央各部门、兄弟省区市和解放军、武警部队援助人员，向为抗疫大战作出重要贡献的广大医务人员、疾控人员、基层工作者、公安民警、志愿者、下沉干部、新闻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城市保供服务人员等，向识大体顾大局、高度自律、坚韧不拔的全市广大人民群众，致以诚挚的敬意！



目 录

要闻专递

李强：我们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1）

抗疫进行时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党委开展“戮力同心，‘供’担使命，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线上主题党日活动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5）

乡村振兴

乡村产业兴旺的意义……………朱启臻（8）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问题与对策……………邝 振（10）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杜志雄（12）

共同富裕

发展合作经济与推进共同富裕之探析……………陶 康（14）
论集体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基础与现实路径
……………米玉生（17）

主管单位：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主办单位：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

出版单位：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编辑部

主 编：马晨辉

副 主 编：孙 玮

胡建华

责任编辑：陈 峡

发行单位：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编辑部

二〇二二年第三期

（总第 214 期）

2022 年 6 月 28 日版

双月刊·公开发刊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25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620/F

三农论道

- 发展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陈晓华(21)
- 高质量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魏后凯(23)
- 实现上海市郊新发展的目标和路径……………张占耕(26)

探索与研究

- 试论“三位一体”信用合作机制……………陈 林(29)
- 论农业保险合作社在我国的发展途径……………郑 彬(32)
- 漫谈“口红效应”等经济景气指数……………黄文忠(35)

农民合作社

-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五个发展趋势……………张红宇(37)
- 自信自强高质量发展农民合作社……………徐旭初(42)

今日观象

- 金融业也需要与时俱进……………周 军(44)

循环经济

- 双碳经济将带来的深刻改变……………
- ……………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45)

方寸世界

- 上海滩多伦路老街散记……………刘古武(47)



中国供销合作社
CHINA CO-OP

地 址:

上海市大木桥路247弄2号2楼

电 话: (021) 64183952

传 真: (021) 64183952

E-mail: gxxhgxxh@qq.com

邮政编码: 200032

定 价: 4.00 元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 事 长：马晨辉

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 朝 金慧明 祝加林

宫鸿冰 桑 佳 黄 胜

秘 书 长：孙 玮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晨辉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会长
王文俊 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心雄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王德强 上海市杨浦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田晓磊 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国平 上海市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朱建国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伍亚生 上海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 玮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总经理
陈代凤 上海市普陀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陈 朝 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陈 湧 上海市黄浦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沈金华 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主任
汪巍忠 上海市嘉定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武文斌 上海市长宁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张自强 上海昊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志鹏 上海好唯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慧明 上海市闵行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祝加林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赵志刚 上海市徐汇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宫鸿冰 上海市棉麻有限公司总经理
桑 佳 上海市浦东新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
黄 胜 上海市崇明区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

理 事（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超 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管理中心主任
朱建强 上海今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晓军 上海浦东登丰农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 颀 上海邵万生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党委开展 “戮力同心，‘供’担使命，打赢 大上海保卫战”线上主题党日活动

●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重要讲话精神和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市供销社党委以党委专题学习、组织各单位党支部线上组织生活会的形式，深刻、完整、全面传达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求市供销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发扬斗争精神，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坚定必胜信心，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作出应有贡献。

一、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5月9日上午，市供销社党委以视频会议形式统一组织开展各单位党支部“戮力同心，‘供’担使命，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线上主题党日活动，市供销社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各支部热

烈交流，充分讨论，以此更加坚定不移地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更加坚定抗疫的必胜信心。同时市供销社党委号召市供销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深刻领会会议精神，坚决抓好贯彻落实，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的强大动力，共同担负起抗击疫情、攻坚克难的重大责任。主题党日活动覆盖市供销社各直属单位党组织9家、基层党支部28个和全体党员。

二、凝聚共识，深刻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铿锵有力的论断，为打赢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政治引领。市供销社党委书记程颖表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和上海市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从严从紧从实从细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求市供销社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持续当好队伍“领头雁”、筑牢思想“主阵地”、弘扬抗疫“正能量”，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集本级自身优势、集供销系统资源，充分发挥和彰显市供销社在抗疫防疫中的独特优势，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和保供保障各项工作，凝聚起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强大合力。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张华表示：要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着眼大局，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充分发挥供销社保供主渠道作用，坚决履行社会责任，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持续坚守一方阵地，始终坚定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信心。市供销社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表示：要进一步践行供销初心使命，继续冲锋在前，持续攻坚克难，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带头当好宣传员、示范者、贴心人，组织和带动全体党员共同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切实发挥好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三、责任至上，担当有我

“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是对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大仗硬仗的重要鞭策、极大激励。在疫情特殊时期，市供销社各直属单位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职能，履行社会责任，以“供销天下，合筑未来”的企业精神诠释着供销人使命担当。市农资公司积极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疫情至今累计销售化肥 6.3 万吨、农药 211.5 吨、农膜 17.5 吨。旗下农得利公司安排专职人员在封闭期间每天运送农资商品，有效缓解了郊区农民春耕备耕农资产品的短缺；吴元农药公司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的同时，迅速启动应急方案，确保人员安全和保供畅通；公司西渡仓库专门安排人员每天对库区进行消杀和除草，协助停泊在码头货船做好防疫和物资供给各项工作。市果品公司全力扛起疫情防控和水果保供职责，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目前已累计保供销售水果、食品 940 吨。下属果品配送公司坚持平进平出、平价供应，根据隔离酒店需求，保质保量完成水果供应 5000 余公斤；同时积极拓展保供渠道，开展社区团购活动，全力保障市民需求，本周已供应各类水果 1000 公斤。好唯加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营工作”，在落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根据企业实际，对复工复产难点和堵点进行排摸，分类施策做好复工复产预案；下属太仓生产基地根据属地相关规定，已完成复工复产，从 4 月 30 日至 5 月 8 日共生产各类调味品 200.08 吨，配送及销售调味产品 198 吨。商业公司多措并举，精准对接小东门街道、兄弟单位，做好街道、方舱医院的保供保运工作，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提速守“沪”“补给线”。截止目前，已对接单位 59 家，承接订单 30.4 万份，其中保供小东门街道 11.8 万份，潍坊街道 5.74 万份。同时承接市国资委团工委·市供销社团委联合举办的“为青年办实事·青春国企抗疫暖心助力”活动，倾听市国资委系统坚守一线的国资系统青年的需求办实事，推出二期青春国企抗疫暖心团购套餐，目前已对接 42 家国资系统兄弟企业单位，接单约 14326 套。资产公司经营的“供享家”白领公寓秉承建立共享和谐的社区文化理念。自疫情以来，公寓工作人员就日夜驻守公寓，不仅管理着门店日常运营事务，还需完成封闭式管理、联动街道、客户信息排查、组织租户核酸检测、安抚租户情绪、开展环境消杀、发布疫情相关通知等大量防疫工作。“供享家”服务团队按照公司党总支的要求，在疫情防控管理上结合自身特点积极探索，建立了公寓的“战疫互助”微信群，发布信息、提供援助、积极解决租户反馈问题、做好正面舆论引导，缓解了租户的焦虑，营造了和谐稳定“家”的

氛围。直属单位联合支部以小我微光投身志愿者大军，汇聚起共同守“沪”的无穷力量，8名党员均完成所在社区报到，并有5名党员持续投入到志愿者活动中。同时公司快速协调物资，紧急疏通运输渠道，发放防疫物资及生活物资，以解决员工后顾之忧和燃眉之急。管理中心第一时间成立“中心抗疫志愿者支援服务”微信群，及时总结工作、互相沟通鼓励、形成团队合力。面对疫情大考，管理中心党员志愿者们尽锐出战，冲锋在前，真情奉献，踊跃投身所在社区抗疫志愿服务，积极配合社区安排，为小区居民发放抗原检测试剂盒、协助核酸检测扫码、为楼道环境消杀、发放小区保障物资、帮助社区特殊群体解决餐食需求、接送血透居民就医、为社区居民理发等，用自己实际行动在“疫”线奋战。中农上海公司党委和各支部各单位坚持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团结一心打硬仗，众志成城守家园，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彰显国有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下属中农上海化肥公司在春耕备肥

的关键时刻，做到早筹划、早准备、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积极对接上游原料工厂及下游客户，加快原料进工厂，肥料成品进村到店入户，一季度累计采购调运各类化肥9.2万吨。市供销社本部党总支严格落实市供销社党委、理事会、工会疫情防控工作各项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动态排摸职工生活和前线抗疫需求，不断为抗疫各项工作提供坚实保障。本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纷纷就地转化，积极投身社区志愿服务，肩扛责任，化身“大白”、“大蓝”，争当“逆行者”，第一时间亮身份、见行动，冲锋在一线，战斗在最前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戮力同心，‘供’担使命”，在市供销社党委、理事会坚强领导下，市供销社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仍将心怀供销使命，勇担战疫大任，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交出一份决战决胜的“抗疫”答卷，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力量。

.....

（上接第20页）

持股、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规范落实劳动群众多样生产要素持股的制度安排，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效结合。在组织形式上，根据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需求，灵活发展合作制、集体联营、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等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发展方式上，以数字化赋能传统行业，以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激发传统行业的活力，实现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在整个过程中应注重劳动群众技能水平提升带动劳动价值提升。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包含完整的价值链、供

应链和产业链，形成足够范围的生产率外溢效应和强大的产业协同效应。在生产服务上，紧紧围绕市场变化，坚持创新驱动，努力增加高品质、个性化、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在文化塑造上，切实加强集体经济理论研究，不断提升劳动群众素质和互助共建意识，大力弘扬集体经济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积极展现集体经济的新时代风采，在高质量发展履行服务社会，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上海新集体经济合作联社）

乡村产业兴旺的意义

● 朱启臻

产业兴旺有多种解释，但大多是从经济和市场价值角度来解读，把产业兴旺等同于农业现代化。对农业而言，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保证国家农业安全的农业，作为国家公共产品来体现，是由国家调控和支持的农业，以保证国家农业安全为目的。如，谷物类农业生产和供应就属于国家投入和保障的农业。这类农业可以与乡村发生关系，也可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如国营农场、农业产业园区等规模化农业。另一类是与乡村发生密切关系的农业，除了为国家农业安全作贡献外，还要立足于满足农民自身需要，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整体进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不应理解为追求乡村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提升。因此，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兴旺有不同含义。产业兴旺是乡村多元经济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一种状态。具体来说，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有三个特性。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谈到乡村产业兴旺人们自然联想到春节期间贴出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条幅。乡村的产业兴旺是指乡村生产充满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乡村各类生产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一家独大不是兴旺，增产不增收也谈不上兴旺。外出打工挣钱再多也不能称为乡村产业兴旺。单一生产一般不用兴旺来形容，因为兴

旺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是通过多种产业的此消彼长或竞相发展来体现和表达的。产业兴旺的前提是生产的多样性，乡村产业的多样性源于农民生活需求的多样性，农民不仅要吃五谷杂粮，还需要蔬菜和肉蛋奶等，去货币化的自给自足消费方式，造就了“小而全”的生产方式。恰恰是这种被认为落后的生产形式，成为维系乡村繁荣的重要条件。首先，生产的多样性有助于乡村资源的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见缝插针、精耕细作等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其次，多样性有助于满足低碳生活的需求。多样化的乡村产业构成减少了村民对市场的依赖，就地生产、就地消费，免去了长途运输和贮存、保鲜等过程的能源消耗。再次，是实现有机循环的重要条件。特别是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乡村生产与生活之间的有机循环是可持续农业的重要内容。最后，有助于分散和化解农业风险。片面理解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结果导致产业单一，生产者过分依赖市场，当市场遇到问题后，农民损失惨重，增产不增收成为常态。而多样化产业构成，可以减轻自然风险，分散市场风险，农民称之为“东方不亮西方亮”。多样化不仅符合生态学原理，比单一化的产业构成更符合乡村的特点和农民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兴旺是农民视角和乡村视角的产业。产业兴旺所追求的不是利润

最大化，而是效用最大化。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关系，处理满足市场需要和自身需要的关系。

二、产业内容的综合性

产业兴旺不仅要求产业内容的多样性，还要求具有综合性。这里的综合性不是指技术的综合，而是指每一个产业要素都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表现为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综合功能体现。如，种植业，同时也体现与养殖业的密切关系，不仅要为养殖业提供饲料，也为禽畜的排泄物提供消化空间，实现种养业的有机循环。再如，农业除了提供农产品这一传统功能外，还具有生态价值、提供景观和休闲环境，在此基础上可以衍生出诸如观光、休闲、度假等产业形态。乡村产业的综合性还指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如农业收获物的粮食用来食用，加工粮食的渣、皮、糠以及作物秸秆可以用作饲料、燃料，还可以作为手工艺品的原料，发展乡村手工业。乡村产业的综合性不仅实现了废物利用，也延伸了产业链条。

在产业兴旺语境下，农业不是单纯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还包含着丰富的农业文化内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农业不仅以鲜活的形态传承着有机循环文化，还承载着一系列农业制度文化和丰富的乡土知识，体现着农民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很多宝贵的乡土知识甚至成为现代科技新发现的重要源泉。同样，乡村文化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纯文化，它广泛渗透于生产与生活中，与生产结合成为乡村产业的组成部分，如农产品品牌的建设离不开文化要素，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生活的结合形成乡村特定的生活方式，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诸方面，也是地方民俗、习俗的重要内容。乡村习俗、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又可以成为现代乡村产业的重要元素。因此，在理解乡村产业振兴时，切忌单纯片面的农产品观念，认为没有所谓的现代农业条件就不可能实现产业兴旺，这是一种误解。

三、产业要素的整体性

整体性强调的是乡村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各个产业要素不是分离的、独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协同性和非线性关系。这些要素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环境、生态、土地、水资源、物种、村落、民宅、劳动力、传统文化、生活方式、民间信仰与习俗等，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乡村特定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过去的乡村发展过程由于忽视乡村整体存在，发展农业和建设乡村过程走过不少弯路，碰到过挫折。如把本来不可分割的农民、农业、农村人为割裂开来，重视农业的同时伤害农民利益，致使农业可持续发展受阻；当我们重视农民收入，鼓励农民外出打工时，忽视了农民与农业的关系，忽视了农民的多种需要，以至于未来谁种地成为农业潜在的威胁；人们机械地理解了农业的专业化，人为割裂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关系，致使循环农业难以为继，导致农业面源污染；单纯的重视粮食生产，致使手工业失落；过分强调商品化生产，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受到限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多在于人为割裂乡村整体性，乡村整体效益难以发挥。

维护乡村产业要素整体性。首先，不要用线性思维方式制定乡村产业规划，而是要树立立体产业思维模式。把乡村的所有产业要素都纳入其中，彼此渗透、叠加，继而产生整体效应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农户的多种经营对时间的利用以及空间的利用远远优于其他生产形式。其次，不能用封闭的思维方式设计乡村产业。封闭性和闭合性是传统乡村产业特征之一，优点在于环境以及内在循环的安全性和可控性，缺点在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难以满足现代生活方式对生产的需求。因此，要在保持乡村生产整体性和闭合性优点的基础上，引进外部能量，为乡村体系注入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问题研究所）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问题与对策

● 邝 振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出现传统生产方式竞争力较弱、乡村产业发展缺乏相关资源、区县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滞后、乡村产业发展机制不完善、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的积极推动、因地制宜。“振兴乡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导向也是其根本逻辑。

一、乡村产业振兴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生产方式竞争力较弱

我国传统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其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投入产出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如我国大豆单产为 300 多公斤，而美国达到了 500 多公斤；2017 年我国每生产一吨小麦、玉米的成本分别为 375 美元、334 美元，美国生产一吨小麦、玉米的成本却只有 224 美元和 142 美元；2017 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1998.2 亿美元，贸易逆差却达到了 495.4 亿美元。由此可见，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

（二）乡村产业发展缺乏相关资源

乡村产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技术、资金、人才、信息、市场、渠道、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而且乡村产业项目投资较大、见效较慢、周期较长，投资回收期一般都需要 5 年左右。而我国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发展失衡。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乡村产业发展的专业素养不高，缺乏相应的战略眼光和各种资源。因此，目前乡村缺乏技术、资金、人才、信息、市场、渠道等相关资源，使我国乡村产业发展受到了较大约制。

（三）区县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滞后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战略规划、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等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安排。但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采用同一种模式发展乡村产业。那么，如何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需要采取哪些策略、办法和措施，这些

都需要从战略层面来考虑。但从调研情况来看，我国各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还比较滞后，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四）乡村产业发展机制不完善

就乡村产业发展而言，无论是从事特色种植业、养殖业或乡村特色旅游业，都需要从上游、中游、下游等各个环节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才能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进而做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附加值。而要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需要完善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作保障。但从实地调研来看，不少地方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还有待完善：一是缺乏《乡村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二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不配套，如农业资金主要用于乡村产业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它产业链环节的支持与扶持较少等；三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融资机制不完善，乡村产业项目的融资非常困难；四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五）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

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但土地问题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村民来说，其土地权益在流转过程之中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在土地流转过程之中有不少问题有待规范。如土地流转形式如何选择、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土地如何折股量化、流转风险如何防患、事中事后如何监管、生态环境如何保护、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如何建立、流转管理服务费如何收取、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如何建设等，这些都需要有具体的相关规定，使村民的土地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二、乡村产业振兴的对策

（一）转变乡村生产经营方式

要加快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步伐，必须改变单家独户的传统低效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从传统的种植业扩展到“农、林、牧、渔、旅”的大农业系统，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

一是加快构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

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二是引导农业大户、青年村民、返乡创业村民、复员军人、大学生等兴办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三是以农产品为载体，建立和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乡村产业链条；四是依托生态农业、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体验农业、乡村特色旅游业等乡村产业新业态，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二）乡村产业振兴需整合社会资源

乡村产业发展最缺乏的技术、资金、人才、信息、市场、渠道等资源，恰是工商企业拥有的优势。因而应利用工商企业的这些优势，与乡村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特色资源、人力资源等进行有机融合，走出一条农工商贸旅相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一是引导动员工商企业和民间资本下乡，组织成立乡村产业龙头企业，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乡村产业；二是由区县干部牵头，利用血脉亲情和乡情乡愁，动员离乡人才中的企业家和优秀人才回乡创业，逐步完善乡村产业链；三是制定《非农村人员去乡村任职管理办法》，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中青年、大学生、离乡人才到乡村任职，带动村民发展乡村产业；四是鼓励身体健康的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离退休人员到乡村咨询指导，发挥余热，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持。

（三）各地制定《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

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有了切实的《规划》，发展乡村产业就可以有方向、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推进，这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通过全面深入的调研和论证，确定各地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二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统筹规划布局，明确各乡镇、行政村的乡村产业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三是围绕乡村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选

（下转第13页）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振兴

● 杜志雄

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七方面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要支持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也专门就振兴乡村产业问题进行了法律规范。

从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来看，特别是就其中的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的发展看，乡村产业发展已整体进入由“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主导，向既重视基础农产品生产和供给，又重视农业农村多功能性产业化和乡村价值深度开发”转化的新阶段。基于该判断，笔者认为在当前谋划乡村产业发展时，要高度重视对乡村产业发展重要趋势和规律的尊重和运用。

除了地处乡村的制造业，可以将乡村产业归类为六“头”经济，即地头经济、猪头经济（畜牧业）、水头经济、石头经济、树头经济以及人头经济。其中，人越来越成为乡村产业振兴最大的生产力，谋划乡村产业的发展和振兴必须注意人的因素。发展这些乡村产业首先需要

培育富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和发展主体队伍。其次，产品和服务要有人去销售和服务。再次，增强乡村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黏性，扩大消费者队伍。

乡村产业发展形成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通过流通半径的扩大实现与更广泛的消费者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产品和服务市场空间扩张和价值增值。把远在深山的产品销售到城市，与城市居民需求的结合是一种长链化的追求。对小众、特色农产品，也可以将消费者引导到当地去消费，即通过建立短链食品消费体系，扩大产品的消费者，从而实现产品价值增值。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其产品市场竞争力，必须适应消费者心理需求的变化，实现由单纯地卖产品向既卖产品也展示产品生产过程的转化。中国已经整体上进入农产品买方市场阶段。这意味着消费者对其消费的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选择。农民除了要像以往那样卖产品，还要告诉消费者这个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以及以这种生产方式产出的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对于农产品而言，将卖产品和产品生产的过程相结合，至少在当下是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的重要趋势和规律之一。

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效果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是其效益的高低。目前，乡村产业发展效益的高低，根本上取决于乡村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产业融合一定要建立在专业化的基础之上，通过专业化提高效率，通过产业融合追求效益。产业融合分为产业形态的融合与产品形态的融合。其中，产业形态的融合较为普遍也容易理解，而产品形态的融合指的是农产品尤其是其中的优质农产品与其他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融合。

发展乡村产业必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要将生态和绿色铸造为产业发展的基因和灵魂。绿色发展是任何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农业已经从传统的保持农产品稳定供给和增加生产者收入的“两目标”走向新时代包括保持农产品稳定供给、增加生产者收入以及增强农业可持续性的“三目标”。农业发展“三目标”齐头并进，推动中国农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产业经营效益，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这是农业现代化以及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上接第 11 页）

择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路径，制定各阶段应采取的策略、措施及办法。四是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出台之前，应组织相关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进行科学论证。五是《乡村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应满足科学、合理、可行的条件，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要求，重视高科技和新技术的应用，向乡村产业应向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和三产融合化方向发展。

（四）完善乡村产业发展机制。

一是尽快制定《乡村产业振兴实施细则》，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意义、原则、方式、方法、模式、流程、负面清单、组织领导、绩效考核、保障措施等进行明确规定；二是从乡村产业发展涉及到的技术、资金、人才、信息、市场、渠道、土地、法规、税费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乡村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三是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建立社会资源整合机制，以农工商贸旅相结合的方式发展乡村产业；四是建立乡村产业发展融资机制，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渠道；五是建立乡村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以调动社会资源从事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并对出现的相关问题与矛盾进行

协调；六是建立农业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对生态农产品的认证进行监督，并加大政策扶持，实现农产品的无害化和市场化发展；七是制定《农村闲置民宅改造置换办法》，引进民间资本合作经营，打造一批精品民宿；八是鼓励成立各种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管理。

（五）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

土地流转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为了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各地应制定《土地流转管理实施细则》，对土地流转形式、土地流转年限、土地流转价格的确定方法、土地折股量化办法、土地流转风险防范、土地流转的事中事后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土地流转管理服务费用收取、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等予以具体明确的规定。

这对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完善区县、乡镇、行政村土地流转服务管理体系，建立土地流转招拍挂制度、履约风险保证金制度、监测分级备案制度和鉴证制度，以及引导和加快土地流转，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发展合作经济与 推进共同富裕之探析

● 陶 康

合作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天然一致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合作社的诞生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困、协同劳动、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发展合作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天然的一致性。

合作制思想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于科学社会主义，最终指向共产主义。合作制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源于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合作社之父”的英国人罗伯特·欧文。他在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设想建立一个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合作社，在合作社中没有剥削和贫困，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协同劳动，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合作社将资本主义和平改造为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合作思想的合理成分，在结合合作社运动

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制就是生产者联合劳动制度，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了合作思想由空想到科学的根本转变。马克思主张通过合作制的道路，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组织社会生产，通过合作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的合作经济思想为无产阶级合作社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农业合作制理论运用于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制理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而唯一的途径就是首先实行土地国有，然后进行农业合作化，积极推行以农业公社为主的农业集体经济形式，最终使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开展合作社运动、发展合作经济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把开展合作社运动、发展合作经济作为重要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组建农会、合作社作为组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重要形式，组织人民群众及部队、机关、学校发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手工业等各种合作社，有力推动了生产发展，有效保障了人民生活和部队供给，为冲破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把发展合作社和合作经济作为推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领导农民群众发展互助组、合作社，在农村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有效发展了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消费品流通，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创新合作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推进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从推行统分结合的农业双层经营体制，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再到推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组织农民切实发展农业生产、参与市场竞争，有效推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把发展和提升农民合作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积极倡导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不断创新合作经济发展方式，为推动农民共建共享共创共富指明了正确方向。

发展合作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实现共同富裕是发展合作经济的最终目标。从合作制在中国的实践看，合作制一经来到中国，就与中国的农民问题结合起来，成为解放小农，组织小农的重要制度。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

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无论是农民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社形式，还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合作社为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问题，推动革命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我们党领导的合作社运动史，就是一部不断解决农民生存发展、带领农民共同富裕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指出，合作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供销合作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探索

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按照合作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以为农服务为宗旨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带领广大农民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浙江省各级供销社积极融入“三位一体”改革，大力发展新型合作经济，促进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和村社组织普遍持股、共建共享、共创共富，走出一条富民强村的现实路子。

一是持续深化“三位一体”改革，推动合作共富。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持续推进“三位一体”改革，全省自下而上将6.61万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类涉农服务组织（企业）全面组织起来，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农合联组织体系，农合联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带动农户共同富裕的综合平台。各级农合联普遍建立健全农民合作基金制度和资产经营公司制度，构建了以农民合作基金为投资引领、资产经营公司为众筹服务、农合联会员和村社组织为主体力量的新型合作经济发展机制，促进农民群众普遍持股、共建共享、共创共富。如温州市瓯海区农合联资产经营公司——瓯海农合实业公司，联合102个经济薄弱村成立强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地方政府将经济收益功能和商业价值较高的实体项目交由公司运营，2016—2020年，这102个村分红以15%~20%的速度逐年递增，5年累计分红与定向分配达3829万元，实现了薄弱村自我造血功能。

二是创新股权投资模式，推动产业共富。

在推进东西部对口帮扶过程中，浙江省供销社充分利用各类帮扶资源和农户自身拥有的资源，将资源变资本，作为贫困户加入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的股金，并给予固定分红，为农户带来持续稳定收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帮扶资金量化折股，约定分红。浙江省供销社下属新大集团在普安县成立贵州新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地方政府给予贫困户2万元财政扶持资金作为入股资金，用于购买100只成年兔和5000元饲料，委托公司进行为期三年的集中代养，所有权归农户。三年后，一次性返还农户种兔135只，年保息分红不低于8%，即每年1600元。对信用度较好的贫困户还可以利用农信机构的“特惠贷”资金，获得3—5万的免息贷款，入股新普公司，按年息12%保底分红。二是生产要素参股入社、保底分红。浙江省供销社参股浙江蓝美公司，与四川省供销社下属农业会展集团公司合股组建四川省蓝之美农业科技，在四川省发展蓝莓产业种植。蓝美公司鼓励村经济合作社或种植大户牵头，吸纳农户以劳动、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入股，组建蓝莓合作社，将政府和社会的帮扶资金以优先股形式参股到蓝莓合作社，并量化到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集体经济薄弱村，让贫困户和薄弱村享有保底分红。

三是构建市场联结机制，推动消费共富。

依托浙江接近消费市场的区位优势 and 供销社系统经营网络健全的市场优势，与东西部对口帮扶地区建立联结机制，设立对口地区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206个、线上销售专区36个，并给子免进场费、服务费、扣点费以及多渠道免费推广的“一不四免”政策支持。依托供销社现有线上销售渠道，打造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特色销售馆，共享当地农产品平台和流量资源。

如绍兴市上虞区供销社依托大通电商淘宝、京东、供销e家等6家农产品电子商务网上销售平台，帮助销售对口援建地区农产品，共享百万流量。浙江省供销社还举办浙江省供销社系统消费扶贫样本发布会暨扶贫产品联供联销推介会，发布了五大消费扶贫样本、编制发布了第一批扶贫产品联供联销目录，并组织全省系统58家重点经销企业搭建了省级联供联销平台。联合9个省直部门推出浙江省消费扶贫购销平台——“浙里汇”，截至去年末，累计销售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787万元。

四是搭建村社共建平台，推动投资共富。

将供销社的经营管理优势与村集体优质资源结合起来，带动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农户共同富裕，是浙江省各地供销社开展为农服务的新亮点。如在开展省内结对帮扶工作中，省供销社将兴合集团600万元结对帮扶资金量化到常山县球川镇6个集体经济薄弱村，作为入股资金，与常山县供销社、球川镇工业公司联合成立常山县球川蓝之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每年给予结对村不低于10%的约定分红。杭州市余杭区供销社通过县基联动、村社共建，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开发，余杭区供销联社、塘栖供销社和云会村经济联社组建成立“杭州云润乡村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云会村以资源入股，股份占比51%。村社利用这个平台，深度开展云会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海宁市供销社联合相关镇、村共同试点实施“NI+菜园子”项目，组织农民利用农村房前屋后闲置土地和空余时间露天种植蔬菜，将菜园打造成低收入农户的钱袋子，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前项目在海宁全市种植面积达785.4亩，涉及低收入农户770户，每亩可增收4800余元。

（作者单位：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论集体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 历史基础与现实路径

● 米玉生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又进一步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具体部署。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努力。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经验，可以从中揭示其与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探求在共同富裕历史阶段初次分配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

一、城镇集体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我国集体经济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始终肩负着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生产力发展、巩固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历史使命，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历史贡献，为实

现劳动群众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切实维护和服务人民需要。“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发展合作社的目的“是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当时，我们党在消费、生产、供销、运输、信贷等多领域开办了合作社。新中国成立以后，集体经济作为民本经济，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困难和商品紧缺年代，产品服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最初的食物、服装、家具、五金、皮革、工艺美术延伸到轻工机械、塑料制品、家电、文教用品、室内装修装饰等行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在这些产业结构基础上，拓展了商贸、餐饮、旅游、出租车、物业管理、教育咨询等服务业，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人民为中心，始终贴近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的初心，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

中，必将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二）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吸纳劳动力、安置就业，长期以来是集体经济的重要使命。我国人口众多，社会就业压力一直很大，集体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少、见效快、涉及行业广。在建国后的几次就业压力较大时期，都成为扩大社会劳动就业的重要渠道。如建国初期，以发展手工业合作社为主，解决了大批失业工人就业；六十年代以发展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为主，解决包括城市家庭妇女在内的社会闲散人员就业；七十年代末为安置返城知青和待业人员就业，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强调“努力办好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大力提倡和指导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据统计，从1978—1982年，集体企业累计安置待业青年1237.9万人，占同期城镇安置就业人数的32.3%。邓小平指出：“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九十年代，为了帮助国营企业解决职工下岗潮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安置，集体企业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从2014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的不同岗位平均工资数据对比来看，集体企业从业人员2013年度平均工资为40025元/年，2020年度平均工资为62968元/年，年均增幅8.2%，与私营企业岗位平均工资及增幅基本接近。综上所述，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配合、共同发力，解决我国多层次众多劳动群众的就业需要。

（三）巩固基本经济制度，大力促进生产力解放发展。1956年底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集体经济的存在与发展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所决定。集体经济从诞生之始，就具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质，

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实现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经济基本实现了自主灵活经营，适应了我国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发展需要，在繁荣市场、广泛吸取社会分散资金、增加国家积累和税收、出口创汇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1857.0万个，其中集体企业12.3万个，占比0.6%；国有企业7.2万个，占比0.4%，集体企业比国有企业多出5.1万个；在轻工业、建筑安装和装饰装修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等行业，公有制经济主要是以集体企业的形式参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生产力总体还不够发达，集体经济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证明，集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和否认，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它仍然适应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需要。

二、城镇集体经济基本经验契合实现共同富裕内在要求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集体经济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的价值追求和组织起来的强大合力，有过曲折与艰辛的探索，但总体上实现了平稳发展。

（一）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是由于党领导一切这个独特优势，集体经济才能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嬗变过程。党的领导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根本保证。集体经济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密切相关，结合每个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历史任务，党引领着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赋予其不同阶段不同的历史使命，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各方力量整体推进，保证了集体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长期以来，集

体经济主要面向弱势群体的组织和联合，坚守着为他们谋利益的价值定位，这就决定了集体经济难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壮大，需要取得党和政府的扶持，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之一。2017年底上海市级层面城镇集体企业整合聚力，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城镇集资集企改革工作推进领导小组，通过对市级集体企业整体改造，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集体联合经济组织（联社）的企业法人地位问题；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集体企业改革中资产调整等不公平待遇问题得到了解决；通过在全国层面率先出台新时代完善城镇集体资产监管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城镇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得以奠定。正是在党的领导和重视下，上海城镇集体经济才能在新时代再一次迸发出新的动力和活力，继而能为推动共同富裕作出应有的新贡献。

（二）坚持互助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马克思主义集体经济思想和理论观念源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思想，经过合作社运动的实践检验，成为了我国集体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19世纪中叶，在欧洲的穷苦工人及其失业者为了生存，产生了“手拉手，一起干”的互助性合作社。遵守自愿、平等、民主、互利、共有、共享等合作原则，合作社成员的经济利益得到实现，社会地位得以提高。目前国际合作社运动仍在蓬勃发展，国际合作社联盟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会员组织，代表的合作社达75万个，社员总数达7.6亿人。我国集体经济在强调生产资料归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基础上，遵循合作经济基本原则，在集体企业中始终提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精神，劳动群众共同劳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互助合作，这不仅维护了劳动群众的就业权和发展权，而且也丰富了劳动群众的精神生活，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为不断满足

劳动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劳动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起到了培育教化的先导作用，新时代仍应继续大力弘扬。

（三）坚持组织起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就提出“组织起来、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集体经济始终把“组织起来”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是对单个劳动群众的组织。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遵守“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原则时，生产效率明显高于个体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是对分散的基层集体组织的组织，为适应手工业合作化进展需要，1957年我国成立了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自下而上形成了全国体系的城镇集体联合经济组织（联社）。全国总社和各级联社作为集体企业主力军，在积极推进自身改革、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始终高举集体经济旗帜，充分发挥所辐射区域内集资集企改革发展的指导作用、企业和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的维护作用、集体资产的监管作用、企业间合作互助的组织服务作用，以及推动各级政府政策制定的建议和协调作用等。因为有了全国联社系统完整的组织体系和作用发挥，所以党对集体经济的各项任务要求得以全面贯彻执行，众多中小型企业有了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青岛海尔、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城市集体企业改革先行者步鑫生等一批先进典型，生动地诠释了集体经济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中，面临着各种风险挑战，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只有组织起来的个体才能够有效降低和抵御不确定的各种风险。

三、城镇集体经济在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其中，初次分配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起着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明确集体经济定位、释放其活力，发挥集资集企在高质量发

展中推动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

（一）明确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初次分配的基础在于就业。如果单纯把集体企业看作市场竞争主体，那它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竞争优势明显不足。然而，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历史阶段的今天，集体经济就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共同富裕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富裕。当前，我国的发展仍处于不平衡不充分阶段，仍将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要带领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就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的要求。对于集体经济来讲，应承担起“帮扶弱势群体”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这是集体经济的初衷，也是集体经济的天职。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渠道，一是现有的集体企业；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改制成为集体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三是由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各级集体联合经济组织（联社），探索以社区、行业等为单位，以需求为导向，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组织发动弱势群体建立生产、消费和服务等各类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采取灵活的就业方式，按照合作社原则经营管理。开办资金来源不足的，可以由集体联合经济组织（联社）提供低息融资或投资入股，待具备一定规模后赎回；也可以吸收社会公益资金扶持。

（二）释放共建共享功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形成机制，发挥收入分配机制作用，切实“分好蛋糕”，有利于合理控制初始分配差距。集体经济调动劳动群众积极性的最大优势和特征在于鼓励劳动者投资入股，劳动群众不仅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有按劳取酬的权利，也享有企业经营成果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然而长期以来集体经济的这种属性未能很好地落实，丧失了固有的优势和活力。新时代集体企业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加快完善功能性分配格局，一方面，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群众劳动报酬，在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群众

收入同步增长；另一方面，要健全劳动、资产、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积极探索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规范劳动群众以多样生产要素投资入股，切实落实“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制度安排。既充分发挥投资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又注重劳动群众与资产所有者的一致性，在一定规则下可以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利润的分配，从而使劳动群众共享更丰厚的发展红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这方面问题解决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集体经济在加强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形成更积极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有着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比拟的机制优势。

（三）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集体经济能否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历史阶段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还是取决于自身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集体企业，在具备符合市场和人民群众需求的特色产业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还拥有在发展过程中留存下来的大量优质资产，这些都为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集体经济应紧紧围绕新的历史使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做大蛋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产业布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布局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积极布局城镇化地区的特色产业塑造和链接，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尽可能形成定位互补的格局，并充分发挥现有的老字号品牌和优质集体企业的带动效应。在产权形式上，积极发展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交叉

（下转第7页）

发展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 陈晓华

发展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大课题，事关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大局，必须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认识，积极探索并不断创新。

一、通过有效服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据统计，目前包括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服务公司在内的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化专业组织已超过 90 万家，服务面积达 16 亿亩次，服务农户 7000 万余户。可以说已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之举。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积极向农户提供生产服务，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和保障农产品供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大国小农的特殊国情农情背景下，发展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特别重要。

通过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帮助农户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通过社会化服务带动和引导小农户走向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碰到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解决小农户问题。而解决小农户问题，就要将他们引导到现代化轨道上来，而通过服务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的。

通过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采取统种统收、统防统治等一些方式，来实现连片种植、降低成本的规模效应，也就解决了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二大难题，即规模和效益。农业现代化的规模发展在不同产业有不同方式，尤其是在粮棉油生产上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规模经营道路，不能靠简单靠土地规模，而是要靠有效的服务。这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实现农业规模化发展的路径，通过有效的统种统收、统防统治来实现，这是发展的路径和方式的转变。

二、找准服务发展的短板

我国的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还处于成长阶段，尽管这几年发展得很快，但是与农业农村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别。从调查看，随着农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很大的需求。其实各种形态、各个环节的农业服务比如代耕、代种、代收等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现在提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因为形成了新的服务业态，这是一种新兴产业。以往虽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实践发展没有到位，所以没有形成这样的市场，没有发展动力，而现在有动力了，就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来破解难题。

目前服务供给和服务需求还不能完全匹配。一是服务的能力不强，技术装备比较落后，服务规模、服务半径都比较小。大部分还是以区域为单位提供服务。二是服务领域不宽，产前产后服务比较少。三是服务质量不高，专业

人才比较缺。四是缺乏标准化的服务流程，要实现“放管服”，首先面临的是服务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化的流程，很难形成有效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三、大力扶持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

将现有的各种政策集成一个与发展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发展相适应的、全面的政策扶持体系，需要抓住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

一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更好提升服务组织的发展能力。发挥好财政扶持政策，对于服务业、服务者的发展和引导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要加大力度，还要发挥政策工具对产业化的引导作用。要通过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引导各种服务项目向综合服务发展。现在的专业服务有很好的基础，如何在专业服务的基础上向综合服务平台发展。无论是社会服务环节，还是公共服务环节，都要向综合服务发展，在专业服务基础上形成综合服务。比如农机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植保服务，供销服务，现在已经形成了体系，如何对这样的体系加以扩展，这完全可以通过扶持政策来定向引导。通过扶持政策鼓励服务组织拓展服务领域和服务方式，重点把多种形式的订单式托管服务开展起来。一方面引导组织向综合服务发展，一方面引导服务聚焦重点和难点，发展有潜力的服务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订单式服务。

实践证明，订单服务方式更容易让农民接受，利益比较直接，方式比较精细。容易形成市场化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订单扶持应该是政策服务的重点。在财政政策里要用好现有的农机补贴政策、托管服务社会化服务等专门项目，重点聚焦一些关键环节。一些农机服务设备、服务装备还比较落后，要通过加大更新力度，来加快农机更新换代。要探索建立农机作业制度，特别是对秸秆还田回收等绿色发展的服务加大力度。以往农机补贴主要聚焦在购置机具上，今后要向增加作业补贴发展。尤其是对现在政策有要求的，老百姓做起来又比较困难的，符合绿色发展方向的作业应该给予鼓

励，比如耕地保护、秸秆回收等等。并且要建立农业生产服务减免税清单，继续优化对农业服务企业和服务环节的税收优惠。

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解决服务组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创新服务方式和产品，要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与金融机构服务数据间的共享对接，健全支持农业生产服务的综合金融产品，构建支持农业生产服务的综合金融产品体系。深化银行、政府、担保合作机制，拓宽包括服务订单、服务设施在内的抵质押物范围，开发针对农业服务主体的担保产品。

三是扩大保险支持范围，降低服务组织运营风险。农业上，保险对农业产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目前我国的保险业在这方面应该说开发和发展得还不足。应该围绕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来加大保险支持范围和利用。眼下，要解决好服务机具安全事故的保险，解决好托管中的自然灾害损失保险。要健全农事服务质量保险等险种。

四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生产服务条件。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其中有一条就是服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基本农田建设中的田间机耕道、农机场库棚、农资储藏库等一些配套设施建设，这也是新基建建设中应有的追求。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中，开发农业生产服务应用软件和数据平台，以现代互联网技术整合利用各类服务资源，促进服务主体与生产主体有机衔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五是注重服务人才培养，打好服务组织的发展基础。把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人才列入各级乡村人才培养计划，探索实用的培训内容和方式，把专业化服务作为一项培训项目，专门培养专业服务人员和组织，要像培养种田能手、养殖能手一样，重视对服务人才的培养。在一些农业职业院校中，也应当开设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课程或专业，开展农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做好有关农业服务有关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农业社会化服务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

（作者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高质量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 魏后凯

当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已经进入高质量持续推进的新时期。在新形势下，必须从功能价值挖掘、多元主体培育、新业态催生、新载体打造和新模式构建五个方面入手，全方位高质量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一、充分挖掘农业农村功能价值

农业具有多功能性，除了提供农产品和生态产品外，还拥有教育、文化、景观、休闲、康养等诸多功能。同样，乡村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场所和城市的后花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都承担着特殊的功能，具有多元的价值。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和乡村的多元价值，是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村产业发展更好地承载乡村功能，凸显乡村特色，体现城乡分工，乡村产业才能更具活力，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如果乡村产业不能充分体现农业农村的功能价值，简单模仿甚至照搬城市的做法，将会失去其发展特色和竞争力。

因此，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截至2020年底，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为2.4:1，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未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支持农业大县

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产地和县域产业园区集聚，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不能再走低水平同质化的老路，要突出各地优势和特色，充分挖掘农业农村的功能价值，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走特色化、精细化、集群化、品牌化之路。

从挖掘农业农村的功能价值出发，各地应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建立各具特色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这种乡村产业体系的特色具体体现在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和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上。就拓展农业多种功能而言，其核心主要是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充分挖掘和拓展农业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休闲功能、教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推动农业产业链条的多维延伸；二是按照前后两端延伸的思路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构建贯穿于农业生产全过程、全方位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的纵向融合和一体化；三是促进农业与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电商物流等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的横向融合和一体化。就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而言，还需要充分发挥乡村的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价值，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型服务业，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提供产业支撑。

二、培育农村产业融合多元主体

与城市产业融合不同，农村产业融合主体除了企业和机构外，还有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和广大农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推动新型生产经营和服务方式加快普及，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加快向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融合化、绿色化方向转变。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9 万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547 家，省级以上近 1.8 万家，市级以上近 6 万家；纳入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超过 300 万个；农民合作社达到 225.1 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 90 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过 16 亿亩次，各新型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中发挥了重要引领带动作用。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促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积极培育多元化的产业融合主体，鼓励龙头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基础上不断“做优做高”，使之成为引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头羊；同时要继续加强“空壳”农民合作社整治清理和家庭农场规范化建设，加快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转型升级；还要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通过相互入股、组建新主体等方式，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形态。尽管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有力促进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但总体而言，过去长期形成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在全国 2.3 亿农户中，经营耕地 10 亩以下的农户有 2.1 亿户。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小农户仍将会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占据重要地位。为此，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充分发挥新型主体的为农服务功能和联农带农作用，建立更加稳定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全面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指出的是，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不单纯是新型主体的事情，对于农民的主体作用更不容忽视，要依靠政策支持和新型主体的引领带动，引导小农户广泛参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鼓励农民创新创业，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

融合。

三、催生农村产业融合新业态

乡村产业的振兴需要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新业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现有产业领域衍生的新环节、新活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加速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而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又将不断催生出众多的新产业新业态。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既有生物农业、智慧农业、可视农业、阳台农业、植物工厂、直播带货等新技术渗透型的，也有休闲农业、会展农业、景观农业、创意农业、农业电商、乡村民宿等产业链拓展型的，还有订单农业、信任农业、认养农业、农业众筹、社区支持农业、定制农业、共享农庄等模式创新型的，可谓种类繁多，近年来发展迅速。据统计，2020 年我国休闲农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村电商等营业收入已经超过 3 万亿元。

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必须适应当今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依靠技术和模式创新不断催生产业融合新业态。要鼓励各地大胆实践，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产业融合新业态，对那些代表行业发展趋势且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需要注意的是，各地正在探索的一些产业融合新业态，如信任农业、农业众筹、社区支持农业、共享农庄等，由于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生事物，目前还缺乏相应的标准和规范，需要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完善。一方面，要立足于共同富裕目标，积极引导农民广泛参与，使农民能够更多分享新业态的增值收益；另一方面，要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完善各种新业态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出台相关的支持政策措施，引导各种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正因如此，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要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发展，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

四、打造农村产业融合新载体

农村产业融合是多领域、多层次的全面融

合，既可以在一个市域、县域范围内进行，也可以在一个乡镇甚至村庄范围内开展。因此，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中，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自然就成为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载体。无论是市县还是镇村，目前大都把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推进实施的美丽休闲乡村建设、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建设、休闲农业重点县建设等，大都以行政区作为载体，其建设内容也包含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行政区作为产业融合载体，其优点是可以发挥各级政府和村委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地方资源和积极性，但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集聚和发展规律性，并非局限于特定行政区域之内。

为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当前亟需打破城乡分割和行政区划的限制，按照产业集聚和融合发展规律，打造一批有利于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载体。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已经在全国探索创建了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产业链重点链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继续支持创建一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这些现代农业产业园、乡村产业集群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根据农村产业集聚和融合发展需要，突破了行政区划限制，是持续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载体，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尤其是，中国早期的产业集群，如浙江的块状经济和广东的专业镇等，大多是在农村发育起来的。可以认为，以农业产业集群、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等为核心的乡村产业集群，是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有效空间载体。譬如，农业产业集群就是农业及相关产业活动在特定地域范围内集聚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群落，它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链延伸以及农业与二三产业相互融合的结果。

五、构建共享型产业融合新模式

从微观角度看，虽然在一个企业或家庭农场内部也能够实现产业融合，但从中观角度看，无论是市域、县域还是镇域和村域范围内，参与产业融合的主体大都是多元的。农村产业融合的关键，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各融合主体如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和农民等形成一个发展共同体。这种发展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共享型的产业融合新模式。所谓共享，就是各融合主体要公平合理地分享产业链增值和融合发展利益。目前，各地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的过程中，通常采取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电商+合作社+农户等方式，构建形式多样的利益联结机制，如订单收购+分红、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社会保障、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有力促进了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建设，最为关键的是如何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各主体都能够分享产业融合的增值收益，最终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共享。尤其要正确处理好各新型主体和广大农民主体的利益关系，既要从法律和政策上保护各新型主体的合法权益，又要让广大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和融合发展的收益。新型主体通常在产业融合中占据主导地位，应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切实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与新型主体相比，农民主体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要避免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有效防范各种风险。例如，由于缺乏系统的资源估价技术规范和科学方法，一些村庄在将文化旅游资源、土地、房屋、基础设施等入股参与经营时，往往折价入股较低，有的出让期限过长，由此导致农民利益的流失。此外，推进农村产业融合还要有风险防范意识，既要防止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倾向，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线，又要防止工商资本下乡“圈地”，造成耕地被荒废、闲置，或者因盲目下乡和缺乏监管造成“跑路烂尾”，以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实现上海市郊新发展的目标和路径

● 张占耕

上海从来就是大城市小郊区，然而郊区农村虽小，上海的农村农业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明确并坚定不移地实现上海郊区在未来发展中的新目标、新功能是一项历史性任务。

一、新起点、新征途

确立上海未来发展的新目标、新贡献以及实现的途径，必须深入分析市郊的现实基础、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对于市郊的影响和要求、上海在国家大战略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市郊的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

（一）从市郊发展的基础看新起点、新征途

首先，市郊农业具有国内名列前茅的集约化水平。根据农业部对于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测评，2016年上海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76.61分为全国之冠，进入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

其次，市郊农村现代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一是上海郊区农民非农化充分，2018年市郊农民人均年纯收入3037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7倍，其中来自二三产业收入的比重超过3/4。二是市郊乡村基础设施的水准与城市无差别。根据亚当斯密关于农村市政建设与城市一样，农村与城市就不存在本质区别的说法，上海郊区的农村至少在市政建设上与城区没有

本质差异。显然上海市郊农业农村已经基本现代化，正迈向提前实现完全现代化的新征途。

（二）从未来城市发展看新起点、新征途

2020年GaWC（全球城市排名）发布当年世界城市名册中上海名列第五。按照国际区域发展的规律，哪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领先，哪里就会出现全球性城市，伦敦、巴黎，纽约、东京无一例外。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上海2035”的主题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此，市郊的农业农村建设应该提高目标，与超发达城市和卓越的全球城市相匹配。

（三）从国家发展新格局看新起点、新征途

中央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施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要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和基础。推动国内循环的动力一是拉动内需。自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转向扩大内需，现在内需拉动型经济初步形成，顺差与GDP之比已降到国际公认的3%以内，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00%。但是内需的空间没有充分释放，主要原因是占我国人口一半的农村人口的内需没有完全释放。二是

在供给侧。我国的关键核心技术还存在不少短板，农业方面体现为不少种源、农业设施和机械还需要依靠国外的技术和资源。

市郊农业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不可能在规模产能上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大贡献，但是利用上海作为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和科技中心的优势，可以为解决我国农业农村中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设施，开拓农业的国际贸易作出贡献。

（四）从文化特征看新起点、新征途

注重实际，视野宽广，创新开放是市郊农村工作的重要特点和历史沉淀。体现在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时，根据本市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高，实行的是双层经营的联产到劳（户）包干责任制，保持了集体的农业机械和经济实体。根据上海特大型城市的特点，在国内首先提出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战略，市郊农业更是国内城市化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面旗帜。

二、新功能、新目标

新发展中上海市郊的农业农村应该对标上海城市的总体发展方向，成为卓越全球城市的现代农业和农村。生产安全、多元和健康农产品；建设绿色生态文明的田园城市；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并探索具有当代特征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为全国农村农业提供科技、装备和市场服务将成为其中四大具体目标。与这些具体目标对应，市郊农业农村会发生许多功能变化。

（一）米袋子与菜篮子的新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定位不再要求郊区农村具备“城市蔬菜自给，农村粮食自给”的功能。“自给”功能虽然退去，生产功能却不能掉失。米袋子和菜篮子供给依旧不可缺少，但要根据消费市场的新需求有质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常住人口从 1000 多万增加到如今的 2400 多万，新增加的大多是新上海人。在沪工作的外国人数量为 21.5 万，占全国的 23.7%。新上海人和外国人的增加，使上海农产品消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多样性，除了老上海人，还需要符合新上海人和外国人中不同

层次的需求；二是消费者平均收入增加、文化素质也提高了。于是安全性、多元性和保健性将成为上海自产农产品的新功能。尤其是农产品的安全性将成为其中最迫切提高的新功能。

（二）建设田园城市的基础功能

农业的生态和文化功能已成社会共识。农业不只是生产，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代学者对于农业文明中的生态功能进行了测算。据测算，一亩水稻产生的生态效益是水稻经济效益的 4 倍。气象专家测算后认为，上海的延安中路绿地可使周边气温下降一度。相当于每天节约了使用空调所需的 71640 度电。有人测算市郊水稻田的蓄水功能相当于一个容纳 4000 立方米水的水库。笔者考察日本时发现他们的水稻种植在接近城区的地方，在离城市远处则种植蔬菜。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水稻田的湿地效应。

农业是人类与大自然相联系的桥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都能从古老的农业中找到它的最初的依据。人类几乎所有最原始、最根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都可以在农业中得到满足。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该是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即“田园城市”。

（三）现代农业的探索功能

未来 15 年内上海农业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没有疑问，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农业。像美国那样大约需要消耗 200 克石油才能生产一只西红柿，100 克石油才能生产一根黄瓜显然不可取。而目前我国“使用农药如下雨，使用化肥如下雪”的石油“浇灌”的模式也是亟待改变的。全球城市的现代农业的特征：一是在理念上，要从传统的工业现代化转向生态现代化，二是在技术设施上，要从传统的机械化转向智能化、信息化。要探索两者结合起来的新模式，为我国与世界的农业现代化做贡献。

（四）带动和服务功能

作为全球城市的农业农村，必须具有国内外农业的服务和带动功能，以科技、经济和市场优势夯实国家的农业基础。一是种源农业的

研发功能，上海有国内最大的传统蔬菜市场，也是外国品种资源替代传统品种最甚的领域，上海有条件应该在这个领域为我国农业做出贡献。二是农业装备的研发功能。随着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不断的发展，以及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的融合，农业机械化范围已经向农业前和农业后两头延伸。上海应该在我国农业机械和装备的精细化以及农业产前产后的领域多做贡献。三是上海有极大的交通信息和金融优势，居于欧洲贸易圈中心的海牙和北美贸易圈中心的芝加哥之间的区域优势，最具有成为亚洲农产品贸易圈中心的可能。有条件为发展农业的国际贸易提供服务。

三、新路径、新工程

市郊农业农村新发展的路径在于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争做世界一流。把新目标、新功能落到实处。

（一）深化农村改革工程

市郊农业农村的新发展的重点在深化改革。一是要继续坚持和深化市郊改革的成果。如松江在三权分置下的农业规模经营，与国内大多数地区不同，它的鲜明特点是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村落内部的委托经营制。而浦东种植果树的农户，一部分参加了专业合作社，一部分只与专业合作社存在销售合同的契约关系。三权分置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需要我们继续探索。二是在机制体制上解决发展中的新矛盾，如发展村落不涉及农地的服务业和农村手工业势必会需要一些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如何在严格遵循国家用地政策前提下解决。发展在途中，改革在途中，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

（二）城乡融合工程

十九大提出建立加强城乡融合体制与政策的决定，标志着我国从城乡一体化迈入城乡融合的新阶段，城乡融合工程是城乡一体化的升级工程。城乡一体化我市领先于全国，但仍需升级，赋予新内容。

一是城乡生态融合。郊区成为城市的绿色

屏障和绿色基础设施。将农村的绿色渗透到市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长期存在的污染问题。

二是城乡产业融合。村落的闲置资源可以承接城市服务业，开发农村手工业产业。如落户奉贤的企业总部，华为在青浦村落营造研发中心。

三是城乡人员融合。农村轻壮年居住集镇，老人留守村落是当今主流。应该鼓励部分农村年轻人回乡从事上述的乡村服务和手工业，以及现代农业。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建设民居、养老院和住宅群，吸引城里居民来村落居住。人员流动了，生机就多。

（三）农业颠覆性创新工程

上海作为国家的创新中心，农业科技的集聚平台必不可少。孙桥是我国第一个农业科技园区。在农业部与上海市委的共同关心下，2016年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正式揭牌。中国农科院与浦东新区共同签订了《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规划孙桥将作为张江科技城的重要现代农业板块，集聚世界最前沿农业科技资源，可以预见今后孙桥农业科技与毗邻的张江生物医学板块一起将成为国内唯一既有生物医学又有生物农业的生物科创中心。

（四）智能生态农业工程

变土地生产力服从劳动生产率为劳动生产率服从于土地生产率；变农业生态服从农业技术装备为农业技术装备服从于农业生态。运用现代生物科学原理和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根据有利于生态农业运行的原理以及便于操控和节省劳动的原则，设计和以智能设施为主的实施装备。用智能化设施驾驭生产过程，提高生态农业的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并探索配套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作者单位：上海农业科学院）

试论“三位一体”信用合作机制

● 陈 林

2021年3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经〔2021〕2号),鼓励以农民合作社为组织载体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合作,并把推进“区域性联合”放在首位,这是对社区综合合作的重视。2021年6月,《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银发〔2021〕171号)中也提出,推动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

新一轮改革正在到来。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是在互助联合的基础上,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协同与融合;更多注重社区依托,侧重发展综合合作,形成大规模、多层次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都是合作的功能形式。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为各级各类

合作事业包括传统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也为商业银行带来挑战和机遇。“三位一体”合作经济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同样,银行体系也需要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进行合作,以期做大农村市场的“蛋糕”。

一、大力发展信用合作

(一) 信用合作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纵观全世界的农业农村发展,但凡较为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大都以合作经济为主导,其中包括合作金融或信用合作的有效运作。欧美多是专业化的信用合作(合作银行)体系,例如法国农业互助信贷银行、德国合作银行都是在本国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究其本源仍然属于信用合作。亚洲更成功的模式则是多层次、半官方的综合农协(具有公法地位的合作社),内嵌金融功能。如日本农林金库、韩国农协银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信用部,在当地农业农村领域具有绝

对优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迄今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银行体系，更缺乏内嵌金融功能的综合合作组织体系。因此，更要大力发展信用合作。

（二）信用合作嫁接社区合作、综合合作

信用合作、供销合作以及各种生产服务合作，都是专业合作的具体形式。相对于专业合作，社区合作和综合合作很多时候高度同构，而信用合作是贯通各种合作的最佳纽带。

专业合作主要基于“业缘”，其在欧美专业化、规模化农场条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业务多元化基础之上开展的各种综合合作，共享资源与网络，涉及客户对象的高度重合，业务链条的起承转合，便于发挥协同效应和规模优势。在东亚的小农社会，社区长期稳定，基于“地缘”的社区综合合作更有其客观优势。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种情形，这也是“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重要基础。

在交易量和交易频率都不高的情况下，合作金融要存活，就要与“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相结合，嫁接社区合作。德国传统上就有一些兼营供销业务的信用合作社，在农村地区更多。中国台湾地区的储蓄互助社就可以代办与社员日常生活有关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业务，相当于供销合作。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与日本、韩国的农协，更是类似“三位一体”，业务多元化综合运营，内嵌有自己的信用部。

社区熟人社会，蕴含着丰富的信用信息，特别有利于信用合作。缺乏社区合作，合作经济只能是无本之木；缺乏信用合作，合作经济更是无源之水。如果没有综合合作、社区合作、多层次合作作为依托，从经济体量上来说，信用合作很难维持。

（三）信用合作有赖于体系支持，行业管理和政府引导

对于合作经济而言，足够的经济规模与有效的管理半径是一对矛盾，需要通过多层次的合作体系来解决。具体到信用合作，唯有植根于基层社会，才能将合作成本和风险降到最低，也有利于合作成员更多地参与管理。但是，涉

及通存通兑、结算清算以及资金调剂、担保增信、品牌推广、审计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都需要联合组织的体系支持，单靠基层合作是难以为继的。

从2007年开始原银监会陆续审批成立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分布于全国各地，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农村资金互助社都还很弱小，业务过于单一，缺乏社区综合合作的基础，更没有组织体系（联合社、行业协会或联盟组织）的支持，没有发挥互助合作本身的特色与优势。

我国宪法中有关于合作经济（包括“信用合作”）的条文，中央的多个政策文件都允许甚至鼓励“有条件的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但是迄今在具体法律上并无专门规定。

信用合作（合作金融）的行业管理除了监管，还有促进发展的责任。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农村合作金融管理局，1998年更名为“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增加了城市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2003年，中国银监会（现“银保监会”）成立后改为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2015年又改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合作金融之“名”已不存。原有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纷纷改制为农商行。2012年以后，没有审批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

202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农村信用互助业务纳入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统一监管，这为地方改革创新留出空间。但是，笔者认为不能以属地化管理为由，淡化行业管理的必要。如果缺乏中央指导机构，地方上必然无所适从。在央行或银保监会内部，仍应有专门的司局，负责信用合作（合作金融）事项。相应的政府职能可以简化，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合作经济（包括信用合作）的多层次（乃至全国性）联合组织，作为行业性自律管理组织，也接受政府委托行使监管职责。

二、信用合作是一种机制

（一）信用合作可以不设“资金池”

信用合作不一定是机构，可以不设资金池。资金池在便利交易的同时，也产生了特殊的金

融风险。“一对一”或“一对多”“多对一”的借贷纠纷，尚可以通过普通的民事程序去处理，如果形成了“多对多”的借贷纠纷，特别是到了一定的数量级以上，将迅速演化为社会稳定问题，在金融杠杆的作用下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因此，信用合作要尽量避免涉及“资金池”。

（二）信用合作更多的是一种机制

信用合作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机制，因此，不一定建立实体的组织机构，因而无须以金融牌照为先决条件。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的本质是信息。如果我们组织化的方式降低了客户（农民）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有助于提升农民的信用，这其实是一个金融过程，但并不依赖真金白银。从理论上说，在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人群中，轮替开展互助委托贷款，经常调剂资金余缺，可以达到类似合作金融的效果，这就不涉及机构问题、牌照问题，只是作为银行在正常经营范围的一种产品设计（相对于客户，就是普通的民商事契约及其组合）。

（三）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信用合作的内涵

合作经济组织植根于基层，在开展征信评级、小组联保和反担保增信方面，可以充当银行的助贷机构，这已经具有某些信用合作的内涵。如果进一步开展内部资金互助，可由银行全流程托管，从银行角度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委托贷款”，即某个、某几个成员将自有资金委托银行贷给另一个成员。以上两种情况均不会形成“资金池”，尽量把资金流以及相应的账户、支付、结算留在银行体系运转，避免了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并以此化解金融风险的隐患，加强信用发现与增进机制，克服长期以来信用合作难以规范、难以复制和推广的困难。

三、金融科技赋能信用合作

传统意义上的合作金融都是资金池模式，国外更是已形成发达的合作银行体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当然也包括金融机构）

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有其现实合理性。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固然可以将组织机构还原为一系列契约，将复杂契约还原为简单契约的叠加，但其中必然涉及交易成本的上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基本是无解。现在可以借助于先进的金融科技，创新产品和契约设计，优化简化流程，通过互助增信、银行托管、封闭运行等方式，迅速、高效地促成交易，同时避免了新设机构或金融牌照的障碍。还可以进一步创新支付结算业务，帮助建立合作经济的账户体系和簿记系统，促进资金分账、交易返利的便利化、规范化。通过软件设置和大数据监控，有助于防范资金挪用、乃至非法集资的风险。对于需要限定对象和用途的资金，可以采用可编程的数字货币。这也正是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望实现合作经济、合作金融“弯道超车”的优势。正如乘客借助“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只需要一次下单、就可以享受招租服务。网约车平台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复杂高频的市场交易未必都需要“内部化”“机构化”。金融科技平台之于信用合作，也是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金融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机制顶层设计上下功夫，鼓励开展农民合作金融试点，建立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金融体系。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组织化的主要形式。信用合作不仅意味着资金及其收益在当地“内循环”“微循环”，还将持续积累互信，有助于不断改善社会治理，促进共同富裕。商业银行试行嫁接信用合作机制，创新信贷和支付结算业务，实现“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金融构造，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原理的“平台经济”，以探索商业银行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走出一条新型合作化的中国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信用合作联盟）

论农业保险合作社 在我国的发展途径

● 郑 彬

农业保险以农业生产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投保标的，分为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我国 20 多年的保险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是不可行的，目前各地正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农业保险共保体，保险合作社等。

一、农业保险合作社及其优越性

保险合作社是合作制保险形式之一，农业保险合作社是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起来的、由参保的农户为主体、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农户加入合作社时必须认缴一定金额的股本，投保时缴纳保险费。保险合作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员有权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业务结余留在社内归全体成员所有。作为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非营利性互助合作组织，保险合作社相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在经营农业保险方面具备许多优势，在推行农业保险的国家中深受政府重视，并成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一）有利于保险展业和理赔，降低经营管理成本

在农业生产较为分散的情况下，商业保险

公司经营农业保险需要派出大量业务人员深入到农户中进行保险宣传，由于农户保险意识相对淡薄，其收入又因自然灾害及其损害程度的不确定性而十分不稳定，经济承受能力较弱。主观意识和客观经济能力加大了农业保险的展业难度，达成正式的保险合同往往需要付出十分高昂的展业成本。而农业保险合作社一般是在政府的引导下由面对同质风险的农户组成，他们对农业风险保障有着共同的需求，政府的公信力使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合作社自主经营的非营利性性质较深入人心，容易吸引农户参保。

在理赔阶段，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物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价格波动大，损失计算较复杂。尤其农作物在生长期内受灾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受灾当时对损失金额的确认往往不够准确，收获时二次定损才能更精确地评价实际损失，因此对定损的技术和人才要求较高。鉴于农业保险的非盈利，商业保险公司一般不愿在该险种作专用性的资产投资，不愿投入过多资金培养专门的农险人才，在发生灾害事故致损时，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易引起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保险合作社形式下，成员们有权参与保险理

赔过程，他们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对损失程度的评价比较客观、准确，能够提高理赔速度，及时补偿受损农户。

（二）便于保险经营过程中的日常监督管理

保险费率的制定建立在标的物处于正常安全状态的基础上，一旦正常的安全状态受到破坏，就会加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增加保险公司的期望损失，因此保险合同要求被保险人在签约后承担维护保险标的物安全的义务，保险公司也常常对标的物进行检查以监督被保险人的履行情况。按照农业保险合同规定，农户们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使生产处于正常风险状态中，不能因参加保险而疏于管理、置投保标的于非正常安全状态。但是与其他保险险种相比，农业生产较分散，涉及的地域较广，深入农村地区监督、检查农业生产日常状况的成本十分高昂。在合作社形式下，由于经营成果与成员们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促使他们有动机去监督其他成员的行为，又由于农户们同处相邻地域从事生产，也有便利的条件相互监督，这样大大降低了日常监督成本。

（三）减少道德风险造成的低效率

保险中道德风险通常指投保人由于参加保险而改变他们的行为、从而改变保险公司期望赔付水平的倾向，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多表现为农户参保后主动采取措施防止自然灾害造成生产减产的积极性降低，或在发生事故时故意夸大损失程度以期获得更多赔款。在保险合作社模式下，成员们具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双重身份，对保险组织的经营成果拥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有助于强化全体成员主动采取防灾防损措施、尽可能减少事故发生的频率以及在尽力降低损失幅度，能够提高保险经营效率。

（四）保险产品具有价格优势，能够减少投保人的负担

从保险精算角度而言，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由两部分构成：纯保险费和附加保险费，纯保险费用于补偿由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附加保险费用于展业、经营管理费用、预期利润

等方面的支出。由于保险合作社是一种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互助性质的组织，制定的保险价格中不含有利润因素，因而与商业保险公司的产品相比，价格水平更低。同时展业成本、理赔费用、管理成本的降低也使附加保险费减少了，也就是说，在获得等量风险保障的前提下，保险合作社能够减少投保人的总保险费支出，因此更能激发农户参保的积极性。

二、我国发展农业保险合作社的途径

（一）我国发展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可行性

我国农业生产较为分散，地域分布较广，长期以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展业、理赔成本很高，加上农业生产风险事故多发，损失后果严重，我国农业保险经营长期处于“高成本、高赔付”的亏损状态。保险合作社比商业保险更贴近基层，互助共济的形式易于被农户所接受，能够调动投保积极性，节约业务成本。经营过程允许农户参与定损、理赔，能够克服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实践时间短、农业保险人才缺乏、核保核赔难的问题。合作社成员对经营成果拥有的剩余索取权促使他们具有较强的动机互相监督、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尤其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聚族而居所形成的独特的道德传统观念在无形中产生了很好的自律作用，使农业保险中的监管成本远远低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有利于解除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高成本、高赔付”的困扰。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宗旨是成员间的互助共济，具有其他保险组织形式所不可替代的特点。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的产业规模需要不同的组织机构与之相匹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所形成的中小经济体与保险合作社具有天然的兼容性，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互帮互助的淳朴思想观念也有利于保险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的阶段，保险合作社适合作为区域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

（二）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具体措施

农业保险合作社在许多国家推广并取得成

功经验，但各国国情不同，具体操作上各具特色，例如法国主要由农户自愿组成合作社，日本是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成立农业共济组合。制度是不能直接移植的，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特点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合作组织。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自治并不成熟，完全依靠农户组织保险合作社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因此应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开展工作。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在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中应有明确的角色地位，从日本、法国、美国等农业保险运行成功的国家来看，政府通常在立法、财政、宏观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但不直接介入保险组织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我国目前涉及农业保险的法律只有《农业法》和《保险法》，《农业法》第46条规定“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保险法》仅在第186条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规范，因此首先应当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从立法层面对农业保险的地位、实施方式、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财政支持方式等予以明确，否则政策的随意性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会影响农业保险合作社的正常发展。

在推行农业保险合作社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发挥积极的宣传和引导作用，帮助农户成立保险合作社。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农业生产状况不同，适合建立多层级的保险合作社。首先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基层农业保险合作社，由合作社成员推选代表，负责本区域的保险签单、保费收取、日常防灾防损、理赔等业务，充分发挥信息优势和地理优势，实现低成本管理。基层合作社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应避免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否则一旦不能真正实现民主管理和透明化运作，成员们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合作制保险的优势将无法发挥出来；其次以县为单位建立保险合作社服务机构，结

合本县的气候特征和种植、养殖特点为本县的保险合作社提供基本的气象服务、业务指导和业务联络服务；最后建立区域性的保险合作社联社，由于我国1994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故适合建立以省为单位的保险合作社联社。省级联合社的职能有两点：一是为基层提供业务服务和监督管理，包括农业生产技术、防灾防损、定损理赔的指导以及保险费率厘定等，二是为基层合作社提供再保险，在省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

在保险费率制定上，由于各省的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风险保障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适宜各省自行确定费率，保监会、农业部负责监督和指导。保险费率的制定以不盈利为原则，各级政府应充分考虑参保农户的经济承受能力，为农户提供保险费补贴。试点地区的实践表明，提供保险费补贴能够有效激励农户的投保热情，提高参保率，因此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力状况，针对不同的投保标的制定补贴标准，鼓励农户积极投保。另外，保险合作社的资金主要由社员认缴的股金和缴纳的保险费组成，初创阶段资金积累较少，难以保持经营稳定性，政府还应当提供一定的初始资本帮助合作社创建和运营。

（三）建立再保险机制分散风险

尽管保险合作社具有自身优势，但这种模式只适合在一定区域内经营。经营规模小，保险资金积累速度慢，难以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也难以应付重大灾难事故。尽管通过省级保险联合社实施再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但农业生产关联性强，必须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才可能释放巨灾风险，因此不可能单纯依靠保险合作社这种形式经营农业保险，政府应当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专业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合作社提供再保险，并通过成立农业巨灾基金、发行巨灾债券等多种方式才能使农业风险尽可能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得到有效分散。

（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漫谈“口红效应”等经济景气指数

● 黄文忠

二次大战后，随着数理经济学的发展，相继出现了预警指数、一致指数、先行指数、滞后指数等一系列经济景气指数，进而形成新的经济景气理论。同时，诸如扑克牌销售指数、鳄鱼效应、裙摆指数、口红效应等传统类指数也依然风行。其中，男士内裤销量指数系美国前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于八十年代所发现；九十年代我国发改委发现了反映农民工流动情况的“榨菜指数”。其中被广泛运用的，要数产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于美、英、日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裙边理论”和“口红效应”。“裙子”和“口红”都与当红职业女性的常用消费品紧密相关，二者被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理论抽象性和理论兴奋点特征。

“裙边理论”（hemline theory），又称裙边指数、裙边效应，由1920年宾州大学经济学家乔治·泰勒提出的一种形象描述市场走势理论。“经济增长时，女人会穿短裙，因为她们要炫耀里面的长丝袜；当经济不景气时，女人往往买不起丝袜，只好把裙边放长，来掩饰没有穿长丝袜的窘迫。”泰勒发现，职业女性的裙子越短，经济景气度就越高。当职业妇女普遍选择短裙，裙边向上收时，股市随之上扬呈牛市，如上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反之，当职业妇女穿着长裙，裙边向下降时，股市随之下滑呈熊市，市场也逐渐走低，如上个世纪30

年代和40年代。纽约某时装商店不同长度裙子的年销售量与股市指数的走势图相对比，发现裙摆离地尺码与股市盛衰成正比，即裙摆离地面愈高股市指数越高，裙脚着地则股市“衰到贴地”的规律性现象。这一观点已被证明并得到公认。也有人进一步认为，判断时尚消费盛衰，只需要一个“丝袜定律”就可以了。每当遭遇经济危机，职业妇女更愿意穿长裙子，原因在于她们没有更多的钱购买长丝袜，因为丝袜容易损耗，需要额外的花销。

裙子的长短之所以成为经济景气与否的晴雨表，其中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有经济学家观察到：经济增长时，女性倾向于穿短裙，因为可以炫耀里面的丝袜。而当经济不景气时，人们的收入普遍减少，消费的愿望减弱。女性穿长裙代替丝袜把身体更多地遮掩起来，丝袜销量因此大幅度下降。有日本心理学家指出，经济好转会提高日本男性对异性的兴趣，女性会穿迷你裙，从而带动丝袜产业，形成“迷你裙经济效应”，由此拉动一条产业链。

有专家考证，高跟鞋的发明者是路易十四（1638-1715），这个身高只有156公分的法国国王，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挺拔和伟岸，令鞋匠把鞋跟刻意做高，于是高跟鞋得以很快风靡起来。如今，高跟鞋演变成了女性的一种象征符号，职场上鞋跟的高度居然也成为经济景气的晴雨表！美国IBM全球商业服务部门对数

十年来女性鞋子的流行趋势进行分析的结果发现：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一些生产商会生产的鞋跟很高、光鲜亮丽的鞋子会成为时髦女性的选择。因为这些华丽的时尚鞋可以营造出繁华的幻影，帮助人们逃避现实，填补心中的不安全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 70 年代石油危机时期，高跟鞋几度取代平底鞋而成为主流。而在经济平稳、生活较安逸的时候，女性则更愿意选择穿着舒服的低跟鞋，比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低跟鞋十分畅销。有专家称，根据对石油危机、网络泡沫期的研究，发现通常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女性高跟鞋就会开始流行，经济越是低迷，鞋跟越高。

再来看看“口红效应”（lipstick effect）。口红效应是指因经济萧条而导致口红热卖的一种经济现象，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指的是经济不景气时各种“剁手”现象。这一观点最早由雅兰黛诗集团前任董事长莱纳德·兰黛（Leonard Lauder）提出。当经济的衰退时，会降低一些人的消费能力，他们很难攒钱买房、买车、出国旅游等，这时他们手上会出现一些“小闲钱”，而这些“小闲钱”恰好可以购买“廉价的非必要之物”。比如名牌手袋、包包、口红、首饰等商品。因此，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些大牌的口红销量反而逆势而上。作为最便宜的奢侈品，口红既能满足女性的购物欲望，又能缓解经济低迷时的负面情绪，带来心理慰藉。

理论能够成立，需要得到实证。“口红效应”之所以成为经济不景气的“代名词”，有案例可以作为实证。1990 年至 2001 年美国经衰退时，化妆品行业的就业人口却在增加，尤其是 2001 年美国遭受“9.11”袭击后，口红销量翻倍。同样，1996 年日本经济遭遇衰退时，日本影星木村拓哉在当年成为第一个口红代言的男星，轰动全球广告界。广告播出之后，这款口红卖到脱销。2008 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中，口红和面膜的销量大幅度上升，美发美容等“放松消费”也很是不降反升，与其他大宗商品低迷的销量形成明显反差。全球几大化妆品巨头的销售额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足以成立。

经济景气与否，首先发生在消费品市场。由于食品消费有很强的刚性，因此一般不受影响。敏感的是社交类消费品，尤其是职场女性社交类消费品，首先要数裙子和口红。裙子的敏感变化的是变长或变短，口红的敏感变化的是销量或上升或下降，由此成为经济学家观察的一个热点。这种研究的实证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既寓意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副作用，又不乏幽默感，所以“裙边指数”和“口红效应”的理论得以广泛传播。

在经济不景气的状态下消费者购买“廉价奢侈品”口红来安慰自己，这种经济萧条与口红热卖之间的逻辑关系证明了口红的社交属性作用。口红销量激增，说明“有社交需求的女性”人数增加。对女性群体可以作这样一种划分：一是职业女性群体。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萧条，她们都需要消费口红，不受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影响。二是全职太太女性群体。她们居家相夫教子，少有社交需求，其口红消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三是部分需要寻找工作的女性群体丙。由于经济不景气，养家的男人或失业或降薪，于是全职主妇必须出去工作。社交产生需求，带来了口红销量的上升，这是谋生压力所致。显然，经济萧条期的口红热卖，很大一部分是女性需要外出寻找工作增加家庭收入的结果。口红热卖的背后，很大可能是伴随着西装、衬衫、皮鞋、领带等男士社交产品的销量下降。

裙子、口红、丝袜、高跟鞋，这类时尚消费品的消费主体，大都是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职场年轻女性，收入多在小康水平之上，恩格尔系数较低。属于中产阶级群体。裙子、丝袜等这类本属于夏季的传统消费品，由于有了自动调节室温的办公场所，可以让职场女性实现“裙子丝袜自由”，从而反映市场景气状况。经济学家方能从裙子、口红、丝袜、高跟鞋等中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中，通过调查统计找出规律性现象，抽象出相关消费品的销售效应、指数和理论，成为市场景气分析的工具，丰富了市场经济学理论。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我国农民合作社的五个发展趋势

● 张红宇

农民合作社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载体和组织形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发展，要求把农民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当前正值“十三五”规划目标即将完成，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迎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新发展阶段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了发展良机，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把握大势，以人民为本，实现农民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是本文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一、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发展的最好时期

农民合作社发展在我国的实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源起到今天，已近七十年历史。有好的发展时期，比如互助组与初级社阶段。也有发展不好的时期，如高级社与人民公社时期。

检验好与不好的标准有若干，但归根结底，除了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外，从内生动力来看，农民愿不愿意、主不主动入社是最核心的方面。简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农民自觉自愿组织参与的，都有好的表现，而违背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靠政府行政命令推动的，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不良效果。据此，笔者认为现阶段是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最好时期，其依据是：

数量多。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不仅合作内容不断丰富，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而且是迄今为止我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发展速度最快、数量最多、覆盖农户最广的组织形式。特别是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发展。农业农村部统计，2019年，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登记数超79万家，其中种植业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187亩。全国经县

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 9 万家，引领带动 1.25 亿农户。各类生产性服务组织 44 万家，覆盖服务 6000 万农户。而同期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有 220 万家，入社农户成员约 1.22 亿户，普通农户成员占比达 95.4%。与此同时，全国发展了各类联合社超过 1 万家，平均每个联合社带动 12 个成员社。

领域广。随着农业产业链延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农民合作社从纵横两方面拓展生产经营范围，服务领域不断扩大。尽管聚焦农林牧渔业产品生产的合作社仍占合作社总量 80% 以上，这对确保农产品总量产出，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巩固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最近几年聚焦农畜产品生产的合作社向加工、流通领域延伸，表现出纵向发展的明显态势。而观光旅游休闲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等新产业大大拓展了合作社发展的横向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合作社经营的业态。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有超过 1 万家以上的农民合作社从事观光旅游休闲农业，2000 多家从事民间工艺品制作，2 万家农民合作社开展农村电商业务。农民合作社的纵横两方面业务拓展使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范围不仅覆盖了所有的农业产业以及各经营环节，而且顺应农业产业向乡村产业伸延的趋势，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拓展，农民合作社的内涵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

效果好。合作社发展最好的表现不是单纯的数量增多，而是合作社发展体现了合作的本源和农民的意愿。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为成员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解决普通农户办不了、办不好、不划算的难题。农业农村部统计，2018 年各类农民合作社为成员提供的经营服务总值达到 1.12 万亿元，其中，统一销售农产品达 8182.5 亿元，平均每个成员销售农产品 1.14 万元，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总值达 3020.5 亿元，平均为每个成员购买 4200 元。与此同时，平均每个合作社可分配盈余 5.3 万元，为每个成员增收 1403 元。农民合作社在小生产与大市

场之间搭建桥梁，运行机制和分配机制不断完善，让农民生产经营的成果达到产得出来、卖得出去、卖得出好价钱，让每个参加合作社的成员在其生产经营中达到了省钱、省心、省力的互助互利、共享共赢的效果。

总之，尽管农民合作社是否健康发展可以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其最重要的功能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农民群众有吸引力。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参与了合作社深刻表明了这一点。二是运行机制好。无论是传统的土地合作还是劳动力要素合作，抑或是现代意义的股份合作，技术、资本要素合作，入社农民有参与感、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入社能获得利益是最重要的。合作社发展正处于历史上发展的最好时期判断，有内生因素促成，也有外部环境影响。

工业化、城镇化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 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 2.83 亿，到 2002 年务农劳动力达到 3.66 亿的历史顶峰并开始出现下降，到 2019 年减少到 1.94 亿。与此同时，在我国全部劳动力构成中，从事农业的占比由 70.5% 减少到 2019 年的 25%。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占比下降，既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前提。2019 年在农村劳动力构成中，外出数量达到 2.91 亿，而留在内部的劳动力仅为 1.94 亿，近 5 亿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的仅为 40%。“谁来种地，地怎么种好”，农民有参加合作社的意愿能更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

现代农业分工分业。现代农业发展到今天，不仅农林牧渔各产业的产业链条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细，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生成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催生着不同功能定位的农民合作社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在提升农产品产出能力的现代农业 1.0 版后，现代农业经历了向农村产业发展的 2.0 版，进而在传统产业基础上生成观光旅游休闲农业、“互联网+”等新产业的现代农业 3.0 版后，开始

了农业与加工业、农业与流通业、农业与观光旅游休闲产业相融合的现代农业 4.0 版。现代农业不仅从纵横两方面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的认知，也提供了农民合作社专业化分化的可能和前提。换言之，农民合作社要求组织经营专业化、服务专业化，才能达到成本低、效益好，土地产出率、资源配置率和劳动力生产率高的效果。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农民合作社适应了这种变化的需求。

政府行为引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农民合作社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民合作社的功能定位都有明确的指示要求。总书记多次讲“农村合作社就是新时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式”“农业合作社就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鼓励各地探索不同的农民合作社模式，把农民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各级政府充分吸取过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注重从法律、法规、政策多层次加以鼓励支持、规范引导。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农民合作社是最早得到法律支持的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几经修订出台，对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最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 11 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把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作为指导服务的核心任务，把农民合作社带动服务农户能力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依据，把农民合作社发展质量作为绩效评价的首要标准。并要求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信贷支持、保险保障等多方面的政策举措，体现政府行为导向，强有力地支撑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实现农民合作社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注重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变。

二、要准确判断农民合作社发展大趋势

从全球合作社 100 多年的发展实践和规律看，由于农民合作社内生的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减少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从业者的收入以及共享生产经营成果收益的运行机制

和分配机制，农民合作社迄今仍然是遍布全球覆盖面最广、生命力最强的农民生产经营组织，欧盟和东南亚等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我国农民合作社进入新世纪以来健康发展的事实也不断证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社发展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农民合作社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抛开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外在的组织架构不言，仅从经营方式而论，可以观察到有五个方面的发展大趋势。

规模化。生产经营规模扩张，几乎是世界各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共同规律。笔者对丹麦、瑞典农民合作社的考察发现，丹麦奶业、生猪和粮食合作社由 1903 年的 1073 家减少到现阶段的 20 家。瑞典农业及林业合作社 19 世纪初有 3000 多家，到今天只有 40 家，但同期农民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却不断提升。丹麦、瑞典两国农民合作社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在本国市场占有率基本达到 80% 以上，其中牛奶及牛奶制品市场占有率接近 100%。最近几年，我国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增长呈减缓之势，但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扩张，服务范围拓展是普遍现象。农业农村部 2019 年向全国推荐的农民合作社发展典型案例，尽管其生产经营涉及领域众多，但规模扩张是基本特征。笔者调研过的黑龙江克山县仁发合作社通过农户带农机入合作社，直接流转土地和提供农机作业服务，覆盖耕地 10 余万亩。河北南和县金沙河合作社通过面粉加工企业带动，种植规模由 2012 年的 3766 亩扩展到 2018 年的 3 万亩，近期又开始了跨省经营农地种植粮食。农民合作社规模化最大的绩效是大大降低了成员的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了生产经营效益，市场竞争力也显著增强。

多元化。多元化是最能表现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趋势的典型特征。这种多元化一方面表现在现有合作社领办主体身份多元，除由农民牵头占据高达农民合作社总量 90% 以上，其余由村组干部领办、企业领办的组织架构外，另一方面，所谓多元化更多地表现在由于农业产业边界扩张，从横向纵向两方面生成出多元化的合作社类型，这也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区别于

国际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从横向看，在农林牧渔产品生产基础上，农业产业向乡村产业延伸，使合作社涵盖的内容由生产产品领域向服务于农民生活社会领域拓展。比如电商、养老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过去绝不可能出现。当前不仅经济发达地区常见，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区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农产品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催生出为农民生活便利而形成的新型合作社。从纵向看，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同样产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类型，特别是随着产业链条的延伸，从农资购买合作，农机服务合作到田间生产管理合作，再到生产后期的农畜废弃物综合利用合作，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覆盖了农业生产经营全部环节，比如畜禽粪便运输处理合作社等。在一些丘区山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农民生产特色农产品的同时，发展观光旅游休闲农业，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水平。西南丘区山区农村的茶园游、果园游，既增加了成员的生产经营收入，也为游客提供了体验经历。这类农旅结合的合作社发展迅猛，可持续发展潜力巨大。

融合化。现代农业一方面要求专业分工更细，一方面要求不同产业、不同业态融合发展。不同类型合作社的联合社这些年发展呈方兴未艾之势，对农民的服务能力和带动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资料显示，通过共同出资，共创品牌等方式依法自愿组建的联合社，平均带动12个成员社，经营收入是单一合作社的数倍以上。与此同时，浙江创建的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实践中，不仅同类型农民生产、加工、运销，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增长。而且，基于资源优化配置，互利互惠，共享共赢的不同经营主体组合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在发展。这类融合发展的合作社让入社农民的不同诉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覆盖面更广，在联结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企业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从全球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看，北美由于地多人少，农业家庭经营具有规模优势，自我经营、自我服务的内生动力强，家庭农场具有可持续发展动力。而欧盟和东亚等国，家庭经营规模普遍小于北美，决定了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加社员从业收入，增强竞争力，组织起来，互助共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明显。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要求下，全球经济表明，通过注入现代经营管理理念，增强市场竞争力，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荷兰最大的乳业合作社菲仕兰通过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企业化模式，在内部构建了一个会员奶农、合作社董事会、公司管理层三方严格捆绑、相互制约、互惠共赢的新型合作机制，不仅为合作社发展注入了现代管理理念，也为合作社企业化经营提供了成功范例。从我国的实践看，凡是有企业引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都表现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合作社企业化表现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企业直接领办合作社。广东温氏集团生猪、禽肉养殖从“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向“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极大地降低企业与农户的交易成本，实现了互利共赢。正大集团在湖北襄阳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实施中，通过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解决了种猪场建设用地问题，实现了农民获益和企业获利的利益共享问题。河北南和县金沙河农民合作社能实现规模化经营，与依托金沙河面粉加工企业高度相关。总之，凡是采取企业化的经营方式，“企业+合作社”企业有可靠的各种资源要素供给，农民也因此得到稳定的收入增长。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扩张后，采取企业化的经营方式。以产业为基础，资本为纽带，纵向参股，横向联合，不断创新经营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总之，企业化意味着有品牌塑造能力、市场占有率以及足够的竞争力，企业与农户在合作社的框架下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系机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规范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总体上看，随着法制化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引导，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法律要求下，农业农村部修订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示范章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依规办社提供了制度基础。各地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纷纷出台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到2019年底，全国县以上示范社达15.7万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达8000家，充分显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历简单的数量扩张后，已进入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三、努力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核心聚焦两方面：一是为成员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二是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为此，需要把握全球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共同规律，认真研判形势，在理念、制度、政策、措施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从理念上看。国际国内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迄今为止服务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最佳组织方式，在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更具可持续发展的长久生命力。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突出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于农民的本质要求。构建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成员收入，共享收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维护社员共同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权利，实现真正意义上民管民收益的监督机制以及符合社员意愿的入社退社自由机制。

从制度上看。既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充分证明其内生机理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效形式，并且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那么，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鼓励支持各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发展的同时，各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优于对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制度是上层建筑，是四梁八柱，由此在政府行为规范上要依法保护每个社员的合法权益，依法支持合作社健康发展。

从政策上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政策目标，决定了政府行为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比如强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场所建设、用地方面的支持力度；同时完善财政政策，改善金融信贷服务，扩大保险支持范围，鼓励拓展市场营销，采取数字先进技术，支持培训人才、引进人才、提升人力资本等政策保障能力和水平。相关政策要聚焦合作社，强化合作社的带动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要丰富合作方式，既鼓励支持纵向延伸产业链的合作社以及横向同类合作社规模化发展，同时也支持和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他主体开展的联合与合作，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种发展模式。

从保障措施看。一是提升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领导对合作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大力支持工商企业领办合作社，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组织农民、帮助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方面的作用。三是因地制宜，坚持多元化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一个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本质规定，但并不要求整齐划一。要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形式和运行机制，可以以劳动力入社，可以带资入社，也可以以实物、土地经营权、技术等要素作价出资入社。我国农业产业类型多元，生产经营范围广泛，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多元化、混合型状态将长期存在，不可能一个模式打天下，只要农民群众有意愿，有收益都应得到支持和鼓励，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之路。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自信自强高质量发展农民合作社

● 徐旭初

当下，我国正步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如今，我国农村市场化全面实现，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农业投入品、农村消费品、农产品均已实现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设施化、数字化均在蓬勃展开。乡村工业化深入开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文旅商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呈现，乡村电商化进程正起烽烟。深度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城乡社会经济进一步融合。乡村数字化风起云涌，数字技术已迅速加持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在此新时代背景下，不难发现，我国农民合作社事业也正步入成就与问题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成就与问题并存

一方面，合作社的数量、规模与带动能力持续增长，合作社在发展模式、产业领域和服务功能上日益呈现多元化，日益由专业性经营向综合性经营发展，日益重视纵向一体化，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与农产品营销、深加工合作的一体化。而且合作社积极与其他农村组织制度创新对接，除了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大量组建；合作社的标准

化生产、品牌建设和质量认证水平持续提升；合作社日益走向联合，并开始探索建立类如农合联的联盟性组织体系；合作社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加强等。另一方面，我国农民合作社在总体上依然呈现“大群体、小规模”特征。数量众多，但单体规模普遍较小，实力较弱，在承担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功能时，合作社普遍存在着技术集成水平不高、产销衔接不够紧密、加工流通能力不强、缺乏品牌宣传平台、融资难融资贵等困难和问题。相当部分合作社不能适应农产品电子商务、数字农业发展趋势，对合作社的“空壳”“真伪”问题，社会各界依然存在疑虑和质疑；各级政府部门对合作社普遍存在载体化思维，用时拾之，不用时弃之等。

二、挑战与机遇同在

农民合作社如何伴随时代浪潮与时俱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呢？一言以蔽之，要自信、自知、自强。首先，要对合作社事业保持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合作社两类主体。当前，我国农业农村正迎来一场极其深刻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这样的情形中，农民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符合现代农业发展一般逻辑的内在动

因，也有基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本情况的客观必然，更有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现实要求，还有根植于各地乡土社会的具体情况。因此，要充分认识农民合作社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关键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过程中，合作社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体必将越来越显现出核心作用，必将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品牌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电子商务和智慧农业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必将于扶贫开发、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等多个维度中进一步延展其独特的制度魅力和组织功能。其次，要对合作社事业建立自知。要破除不切实际的“迷思”，理性地看待农民合作社的服务、治理和发展。要破除合作社发展中的“迷思”（思想误区）。例如要破除合作社能够为成员显著增收的“迷思”，事实上合作社首先是为成员提供所需服务的，但是既未必能够完全提供，更不必然能够显著增收；再如要破除机械强调民主决策机制和二次分配机制的“迷思”等，现实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选择。

三、实现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要深刻认识到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今不少合作社存在着内部运行亟待规范的问题，以及有名无实、没有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空壳”问题。这些问题既分散了比较有限的财政扶持资源，也破坏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更破坏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形象。所以，要加强合作社内部组织建设、财务制度建设，此外，还应加强合作社的成员建设，尤其要加强对普通农民群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普法教育工作，从根本上建构起服务成员、民主控制的合作社文化。

要清醒认识到合作社的持续发展，既有赖于有治理的发展，也有赖于有效益的发展。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合作社发展并不只是搭个组织构架、开开成员大会、公布社务财务那么

简单，更需要市场营销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更需要合作社成员之间平等且公平的相互理解和协作。至关主要的是要对合作社事业坚持自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民合作社。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坚定不移地把提升合作社的运营绩效放在首位。在战略上，要多关注市场和合作社自身发展，要主动参与和融入供应链，要构建具有新的合理性的内外部利益协调机制。在治理上，要注意协调异质性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建构既有利于提升经济绩效又促进合意治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收益协调机制。当然，提升合作社运营绩效归根结底还是要落脚于业务发展，积极地、认真地、持续地在合作社经营、运营上下工夫、做文章、出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合作社与成员的经济绩效，更有效地提高合作社的适应性、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从近年来我国大量农民合作社实践来看，合作社基于自身生态位及其情状的业务优化有着很多切入点：规模经营，就是通过扩大生产、经营、服务规模或通过要素（如土地）股份合作，以降低平均成本、提高要素产出；质量提升，就是紧紧抓住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品质，以提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品牌建设，就是通过农产品（或合作社）品牌建设，以提高附加值和市场知名度、竞争力；加工升级，就是独自或联合开展农产品加工业务，以提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能力；产业融合，就是进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农文旅商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出口拓展，就是寻找出口业务，开展外向型营销，以提高附加值和市场空间、竞争力；联合发展，就是通过参与、构建合作社联合社、产业化联合体、行业协会、公共服务平台等，以获得单个合作社无法获得的收益改善；综合导向，就是合作社开展多元化业务经营，以突破专业化经营的限制；企业化运营，就是合作社日益企业化经营管理，甚至兴办合作社企业等。总之，要以自信、自知、自强实现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金融业也需要与时俱进

● 周 军

近年来，数字人民币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这种全新的支付方式，将给日常支付活动带来哪些影响？又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积极作用？

第一，数字人民币与用户惯用的移动支付体验非常相似，使用数字人民币可以充分保障用户的消费需求和支付习惯。然而，作为现金的一种形式，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主权货币，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工具有区别的，绝不能将数字人民币与其他第三方支付工具混为一谈。其他第三方支付工具只是人民币支付的一种手段，没有人民币的价值功能和媒介功能；而数字人民币就是法定的货币，具有无限法偿性，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拒绝她。经过数年努力，我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形成“10+1”格局，包括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10个试点地区及冬奥场景（北京、张家口）。

第二，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与电子支付相比，具备壁垒低、成本低、安全性高的比较优势。而且央行数字货币具有无线法偿性、双离线支付等特征。无线法偿性指的是在货币流通条件下，国家对主币在法律上所赋予的无限支付能力。即每次支付的数额不受限制，任何人都不得拒绝接受。双离线支付是指数字人民币不需要网络就能支付，收支双方即使都离线，也能进行支付。只要手机有电，哪怕整个网络都断了也可以实现支付。这是数字人民币的重要内在推力。

第三，未来数字人民币全面推广之后，包

括一切商业交易场所或资金支付的所有领域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但数字人民币毕竟属于“电子支付类货币”，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运载工具进行，因此，需要注意使用安全。

第四，“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当前，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研发数字人民币是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催生发展动能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社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客观上需要更为安全、通用、普惠的新型零售支付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并以此提升基础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第五，数字人民币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有效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和普及，一些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众即使没有银行账户，也可以通过数字钱包享受金融服务，这有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此外，数字人民币“支付即结算”、低成本特性也有利于企业及有关方面在享受支付便利的同时，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一步降低支付成本。数字人民币钱包设计便于线上线下全场景应用，满足用户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别、多形态的差异化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智库）

双碳经济将带来的深刻改变

● 上海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

自从2020年9月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双碳”目标，“碳中和”正从一个陌生的专业术语成为高频词。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解决气候危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承诺，不仅设定了时限，对我国能源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将带来一场经济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深刻改变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风能、光能等将成为能源主力

百多年来，为了获得电、热等能源，人类早已习惯了燃烧以煤炭、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的使用，推动了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虽然化石能源不可再生，但由于全球的化石能源资源比较丰富，至今，全球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仍然占主导地位。一个世纪以前，全球的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占比高达70%，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油气的占比已超过50%。但其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成为了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主因。因此，碳中和的目标首先指向了能源革命。

人类现有的能源可以基本分为三大类，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化石能源，水能、风能、

光能、地热能 and 生物能等是可再生能源，此外核能也是一类新能源。近年来，能源低碳化、无碳化已是国际大趋势，碳中和的目标将直接促进我国新的能源体系构建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有种观点认为，现在离碳达峰还有8年，我们的碳排放还可以冲个高峰。然而，碳达峰并不是冲高峰，而是走向碳中和的基础步骤。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这两个目标的本质都是低碳转型。对我国而言，就是从化石能源为主转向非化石能源为主，这是一轮深刻的能源革命。所以有必要对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作一次新的认识。目前，我国煤炭的占比仍高达近60%，而油和气的占比较低，且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一定要把丰富的非化石能源资源调整为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碳中和目标测算，到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需求中占比要达到25%，这将促使国家逐步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长期以火电为主的电力行业将逐步减排。

有文献记载，我国技术可开发的风能资源约为35亿千瓦，技术可开发的太阳能光伏资源

约为 22 亿千瓦。而截至 2019 年上半年，我国已开发的风能装机为 1.98 亿千瓦，光伏装机为 1.9 亿千瓦，均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 1/10。可见，逐步发展可再生能源，使其达到高比例是完全可能的。可喜的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在不断下降，拥有一个以非化石能源电力为主的新能源电力系统就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要求电力系统的体制、机制、管理运行等方面随之作出一系列革命性变革。

交通、建筑、家居等将转向电气化

与直接燃烧化石燃料相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无疑是不产生碳排放的清洁能源。作为碳排放的“大户”的工业，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促使我国工业走向电气化。轻工业中普遍使用的锅炉、重工业如钢铁业的使用的高炉都将逐步被电炉取代，各个地方也将抑制发展高耗能产业的冲动，节能、高效将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词。

“双碳”目标对于交通运输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在我国发展迅速，随着碳中和目标的确立，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步伐只会越来越快。交通行业减排有赖于绿色出行，逐步建成美丽中国脱碳的交通能源体系是实现“碳中和”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样，实现碳减排，建筑必须跟进。建筑减排，电气化是关键。未来，各种民用、办公建筑的建造和运行都将实现电气化。各类建筑表面将尽可能安装光伏设备，实现光能发电。在建筑中采用分布式蓄电，建筑内部采取直流配电，实现建筑的柔性用电。我国北方冬季集中采暖所造成的大量碳排放，必须探索利用电气化取代的技术手段，将冬季供热零碳热源目标落到实处。未来供暖、制冷、照明、烹饪、家电都要转向电气化，这将催生多种节能减排的智能家居，甚至电力自发自用也将成为现实。通过优化能源的使用方式，将会催生一大批能源“产消者”。这不仅能改变和优化能源结构，

还将培育新的业态和格局。

随着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能源减排和减碳，将会迎来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公众将会获得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

垃圾分类、节能减排将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

曾经有这样一款网络游戏：根据一个人每天的衣食住行，可以计算出其每天的碳排放量。如今，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明确，人人减排、绿色低碳的行为习惯无疑将一步步地融入所有国人的生活之中。

减少碳排放需要发展循环经济，每个城市的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程度是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一个必备标志。因此，为了减少垃圾填埋，使其高度资源化，必须做好垃圾分类，实行源头控制。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一些城市进行了“无废城市”的试点，力求将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这是走向“无废社会”的开始。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路径除了减排，还有就是碳增汇。植树造林、增加森林是增加碳汇的切实举措。通过植树造林，提升植被覆盖，让大自然成为碳的“搬运工”，这样一种环保理念需要大力宣扬，深入人心，落实在行动中。此外，诸如碳交易、气候投融资、能源转型基金、碳移除和碳利用技术等引导碳减排的政策工具和新技术特点，也将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产业发展机遇，逐渐影响公众的生活。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确立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其广泛，已经超越了能源、交通等具体领域，未来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意义也许不亚于蒸汽机、电力、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它将深刻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而“双碳”目标的达成，需要通过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共识、努力和践行，真正实现经济、能源、环境、气候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滩多伦路老街散记

● 刘古武

多伦路夹杂在上海滩之北的虹口市井之中。这条老街沿用申城旧时取中国方位地名命名的惯例，取自北方察哈尔省的多伦县作路名。多伦位于阴山北麓，乃蒙古语“七个湖泊”之意。这条老街虽无众多湖泊相拥，早先仅仅只是一弯小河浜而已，直到1912年有位叫做窦乐安的英国传教士来此用低价买下周围地皮并填河筑路，从此有了这条路，最初称作窦乐安路也。窦乐安曾被光绪大帝敕封为游学进士，颇似现在访问学者的头衔。这位精明的英国绅士居然借助于上帝之手涉足房地产赚取外快，足以让世人见识西方宗教输出的另一面。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这位老兄终究是这条路的开拓者。其实，多伦路并不长，弯曲伸展一里多地，对于怀揣五千多条马路的上海滩而言，对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这条百年老街却着实令人回味绵长。当年在那位神通广大的上帝仆人感召之下，各路富商纷纷来此置地盖楼，垒筑安居乐园，一时争奇斗艳。于是，老街至今披挂着鳞次栉比、万种风情的老宅。

多伦路由北向南的路首，250号门牌是一

幢二层豪宅，乃当年在虹口乍浦路口开设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虹口大戏院的西班牙商人雷玛斯的府邸。小楼凸显西班牙伊斯兰建筑风格，张扬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对西班牙的征服所带来的文化遗痕：修长的拱券门框和明朗的窗格凹凸有致，加之出挑的小阳台、轻盈的圆顶尖塔，平添庭院的层次感；外墙通体布满精致的阿拉伯式饰纹，加之华丽的浮雕、釉面砖的镶嵌，空间感更显细腻、丰富。这座上海滩绝无仅有的架构在抗战后曾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在上海的宅居，因此被叫做“孔公馆”。此公面慈心贪，在上海滩除却此处豪宅之外，尚有永嘉路389号的英国乡村式花园宅居和东平路7号的德国式花园宅居两处。其实他身在金陵谋职，每星期仅在周末鞍马劳顿往返，其穷奢极欲由此可见一斑。

孔公馆南邻的210号是一处二层花园住宅，为广东富商李氏兄弟所有。抗战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寓所，也称之为“白公馆”。李氏兄弟的另一处并联的同款二层花园住宅则被宁杭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所占，人称

“汤公馆”。这两幢红墙白檐的居所用带有巴洛克特征的四根巨柱统领宽阔的门廊，显露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端庄高贵。顺便提上一句，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童年曾在“白公馆”居住过。这位写作大家善用西洋文学的优美笔调来叙述往事兴衰，不知与他儿时的这段刻骨铭心的阅历有关？

路西门牌 215 号是广东地产商李观森的花园别墅。红色鱼鳞瓦铺就陡坡屋顶、八角攒尖塔楼、三角形山墙、围绕古朴的铁艺护栏露台和阳台、繁复的立柱、简洁的门窗……这座出自美国建筑设计师的杰作却无处不弥漫着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韵味。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沦陷，这条老街上的富商们纷纷逃离避难，几多豪宅皆被日军霸占。此屋亦落入虎口，一度竟沦为伪南京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的官邸。抗战胜利后，梁鸿志以汉奸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就地正法。这幢精美的花园别墅前些年曾移作虹口史料陈列馆，倒也物有所值。

与李观森花园别墅隔路相对的门牌 208 号别墅是另一位广东富商陈仲簏的住宅，其外观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样式，门庭、窗户、露台着罗马古典建筑格调。

缘路南行，门牌 93 号的白色三层老洋房通体焕发出西方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高大的门廊、宽敞的露台，端庄、简洁又不失华贵，此楼系广东茶商赵植初所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民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曾举家寓居于此，这位著名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为这条老街的历史添上了一笔。

行走至此，原本南北走向的老街陡然一路东拐，街北门牌 66 号是一幢体态魁梧的四层庭院公寓式豪宅，乃沪上本地绸缎富商薛氏所居。整齐的柱式外廊、连贯的拱券窗户、宽敞的顶层平台，颇具英国殖民地外廊式建筑的庄重和典雅。

老街除却富商豪宅，也有近代上海传统民

居穿插其间。街东门牌 152 ~ 192 号的永安里便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流行的海派新式里弄住宅群，户户联排，家家毗邻，显然运用了欧洲近代城市集合住宅的建筑语汇。此乃永安公司老板郭氏为其高级职员所建的公寓。

街西门牌 135 弄背后的景云里，是更为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群落，当年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陈望道……皆寄寓于此，这条平民化的弄堂长久地留存着文化巨匠们的足迹与气息。

距景云里不远处的门牌 145 号坐北朝南的老房子弥漫着更为典型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气息，通体连续的券柱排比，吟唱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曲。此处曾作为中华艺术大学所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此，一座现代文学的重镇横空出世……缘此，如今这条老街被冠以“文化名人街”，当年汇聚于此的名流大家之铜雕塑像被一一定格，或伫立或落坐，给沿街的老宅平添几许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丈量这条老街，不能不提及老街东端尽头门牌 59 号的一幢颇具中国宫殿样式的建筑：黄墙，红柱，青瓦，斗拱，飞檐，彩绘，石狮……然而，这居然是一座基督教堂——鸿德堂，乃纪念美国传教士费启鸿而名。如此架构的教堂出自中国建筑名家杨锡镠之手，亦为上海滩绝无仅有。当然，这座历久弥新的老教堂至今仍照旧向信徒们喋喋不休地复述着上帝的福音。

徜徉在这条闹中取静的老街之上，擦肩鳞次栉比、万种风情的老宅，诸多名流大家已成过往，却有无数百姓踏踏实实、日复一日地安居乐业于此。但见街边居家与旧式店铺、咖啡馆、酒吧、西餐厅、书社、老电影院、收藏馆、美术馆、纪念馆交织相融，人间烟火气与历史文化相映，经典怀旧与优雅时尚糅合，续写着老街的百年风情和故事。翻阅这条短促却又漫长、悠远却又静初的老街，感受着这座城市百年人文沉淀的厚实肌理。大隐于市。

上海多伦路老街风貌剪影



海上旧里



孔公馆



白公馆



鸿德堂



景云里



中华艺术大学宿舍



鸿德书房



老茶楼



恒丰茶庄



永安里



王造时寓所



薛公馆



李观森宅邸

“832平台” 消费帮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